

# 滿文《烏喇等處地方圖》考

承志

日本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

## 提 要

康熙二十八年，大清國同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翌年，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素和鎮守寧古塔地方將軍巴海兵分九路視察黑龍江上下游南北各地。其後視察邊界已成為一種制度，每年定期派兵視察黑龍江以北各地邊界，也為以後處理大清帝國邊界問題，提供了一個模範。在此之後，留下了很多有關視察邊界的滿文文書和輿圖資料。這些資料至今鮮為人知，也很少為中國史學界所重視。

本文所探討的《烏喇等處地方圖》即同康熙二十九年寧古塔將軍巴海等人，巡察黑龍江下游以北的亨滾河、兔乎魯河流域有直接的關係。

本文主要利用滿文檔案資料，通過解讀當年九路視察計劃以及人員構成等相關報告，結合康熙時期為編纂《大清一統志》事業，在黑龍江、寧古塔等地反覆調查山川、關隘、古蹟、土產等人文歷史地理狀況的歷史事實。指出在編纂《大清一統志》過程中，利用《烏喇等處地方圖》等輿圖資料，重新繪製各種輿圖的具體過程，進而闡明大清國統治黑龍江下游東北地區的鮮為人知的一段歷史。

關鍵詞：大清國、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寧古塔將軍巴海、亨滾河、兔乎魯河

## 引　　言

大清國<sup>1</sup>時代的輿圖研究，是研究大清國時代史中尚未全面拓展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目前，隨著輿圖目錄以及非漢文檔案史料的進一步公開和整理出版，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和構築大清國時代的歷史。這個時代留給我們的資料非常豐富，記述的文種多種多樣，為我們重構這個時代的歷史提供了多方面堅實可靠的史料基礎。

迄今為止，大清國輿圖史研究，可以說基本上是以漢文輿圖為主，在中國很少能夠看到非漢文輿圖方面的論作。<sup>2</sup>細讀《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清代）<sup>3</sup>和最近出版的《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等輿圖專集，<sup>4</sup>也可以發見這種傾向。前者收入非漢文輿圖極少，收入的個別滿文輿圖一般都簡略而不詳述，也沒有全面介紹圖中的滿文及其具體內容。後者對涉及理解歐亞各地地理狀況至關重要的滿文地名，沒有進行解讀和介紹；索引部分也只錄入漢地（Nikan i ba）的漢字地名，未將滿洲之地（Manjui ba）、蒙古之地（Monggoi ba），西藏之地（Wargi Dzang ni ba），甚至橫跨歐亞北部的俄羅斯之地（Oros i ba）以及中亞、西亞等地滿文地名收入索引部分。這些方法和視點對中國輿圖史研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綜覽這些已出版的輿圖專集和中國漢文輿圖研究歷程，或多或少也表明了人們對非漢文史料價值的無視和忽略。殊不知恰恰是這些非漢文記載的輿圖及檔案資料，為我們研究大清國歷史地理提供了大量的漢文資料所沒有記載的珍貴的歷史資料，我們理應多方面利用這些非漢文資料，彌補漢籍史料的空白。研究非漢文文書及輿圖資料，其意義十分重大。

1 1616年，努爾哈齊（Nurhaci）建立愛新國（Aisin gurun）後，第二代汗皇太極於1636年正式建立大清國（Daicing gurun），1644年入關，直到宣統為止，當時人及其各檔案資料及國際條約，正式國家名稱皆稱大清國。考慮到名從主人的原則，本文使用大清國這一正式國家名稱，意圖理解大清國自入關前後為一連貫的歷史時期。

2 國內非漢文輿圖研究參看張廣達，〈關於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彙》與見于此書的圓形地圖〉，頁29-42。此外明代中外輿圖研究，參看黃時鑑、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清代滿文輿圖，參看拙作《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第4章、第5章、第6章等。新近介紹滿文輿圖的論作，參看吳雪娟，〈論滿文翻譯的歷史與現狀〉以及〈清代滿文輿圖概述〉，惜該文敘述過於簡略，不足以窺探滿文輿圖的全貌。

3 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鈕仲勛、任金城、秦國經、胡榜波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和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鈕仲勛、任金城、秦國經、汪前進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

4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全3卷（《康熙皇輿全覽圖》、《雍正十排圖》、《乾隆十三排圖》）。

大清國留給後人的檔案資料，從文種來看，除漢文外，還有滿文、蒙古文（包括托忒文）、藏文、察合臺文、阿拉伯文、緬文、俄文、英文、法文、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至少十種以上。我們研究大清國時代史，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事實——多語言狀態下的帝國統治問題。目前雖說所能看到的史料數量的多寡有所差異，但非漢文資料在眾多領域，其記述內容之豐富性，也超出了我們的想像。甚至迄今也為新興的中亞各國編纂國史，起著重要的作用。<sup>5</sup>所以，研究漢文以外的不同語文記述的輿圖資料，其價值和漢文資料同等重要。解讀研究這些不同文種的輿圖資料，不僅對中國輿圖史研究帶來新的視野，也將有助於理解世界輿圖史的發展歷程。

早在 1936 年，劉官諤撰文介紹內務府輿圖房所藏輿圖時，專門提及大清國時代繪製的輿圖所涉及的文種包括滿文、漢文、滿漢合璧、西洋文字上貼寫漢文附箋等形式。<sup>6</sup>但是，由於各種原因的限制，很多不同文字繪製的輿圖資料，至今無法目睹全貌，許多所藏機構，唯恐涉及國家機密，秘而不宣。這些限制不僅給研究人員帶來諸多不便，也限制了中國輿圖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最近，有關中國輿圖資料流散世界各地的情況，經過幾年的編目和調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們有機會了解到海外所藏輿圖狀況，從中也可以發見大清國輿圖內容的豐富性和形制的多樣性。<sup>7</sup>我們期待進一步進行跨國領域的合作研究，整理和出版相關輿圖的各國綜合目錄以及圖錄。

在進入主題前，有必要簡單地回顧一下滿文輿圖研究的歷史，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們所要討論的滿文輿圖在研究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需要說明的是，有關滿文世界輿圖以及〈皇輿全覽圖〉等方面的研究，筆者將另外撰文論及，在此不贅述。

早期滿文輿圖的介紹，中外許多論著都有個別提及，但基本都不屬專論。真正開始解讀圖內地名並展開深入探討的研究之作，當推 1909 年，內藤湖南撰寫的《間島問題調查書》。內藤在這個時期已開始利用滿文輿圖，專門研究歷史上的重大問

5 《清代中哈關係檔案匯編》(第 1、2 冊)的出版就是一例。

6 劉官諤，〈內務府輿圖房藏圖紀要〉，頁 135-146。

7 歐美圖書館收藏的中文輿圖情況，參看李孝聰編著，《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和《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滿文輿圖目前還不見專目出版，各國收藏的有關滿文圖書目錄中有個別滿文輿圖提要，可資參考。英國倫敦藏個別滿文輿圖參看 Walter Simon and Howard Nelson, *Manchu Books in London: A Union Catalogue*, pp. 33-34. 漢文輿圖情況參看華林甫，〈英藏清軍鎮壓早期太平天國地圖考釋〉，頁 66-77；〈英國國家檔案館藏中國近代輿圖〉，頁 28-33。據該文末尾標註，將出版《英國國家檔案館藏近代中文輿圖》一書，期待早日問世。

題。在內藤的文章中利用摹寫的《滿洲文長白山圖》（調查書地圖第二，原圖藏於奉天宮殿翔鳳閣）（圖1）、《滿洲文盛京圖》（原圖藏於奉天宮殿翔鳳閣）（圖2），分別詳細解讀了兩張滿文圖的全部地名，並註明滿文、拉丁字母轉寫和對應的漢字地名，為滿文輿圖研究首開先河。<sup>8</sup>通過內藤的研究也可得知，當時的奉天故宮還存有其他幾幅滿文輿圖。<sup>9</sup>

1914年，稻葉君山撰寫的《清朝全史》（上冊）敘述中俄關係初期的一節中，刊載了一幅題名〈康熙初年滿洲地圖〉的滿文輿圖（後被稱之為〈羅振玉舊藏地圖〉），但未對其內容進行解說。<sup>10</sup>這幅滿文輿圖後來由德國的福克司（Walter Fuchs）、日本的吉田金一、船越昭生等學者相繼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很多鮮為人知的重要問題。但最終未能全面解釋該圖的來歷、繪製經過以及繪製年代等基本問題。詳見後敘。

1925年俄羅斯學者巴托爾德（В. Бартольд, 1869-1930）簡明扼要地介紹了俄羅斯和大清國之間的交涉過程，其中就涉及到了繪製輿圖的問題。文中雖未介紹滿

<sup>8</sup> 《間島ノ版圖ニ關シ清韓兩國紛議一件 付屬書内藤虎次郎調査報告》10，《間島問題調査書》，第六/2，《滿洲文長白山圖》，頁424，《滿洲文盛京圖》，頁441-442。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1900年以前，論及滿文輿圖以及目錄等中外著作亦有不少，泛論居多，故略而不記。內藤湖南研究東北史地的成就，早在1934年引起國內學者矚目，詳情參看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頁155-167。關於康熙時代滿文輿圖表現的獨特風格，1944年，內藤湖南在《清朝史通論》頁114-115中，提出「中國地圖自古不把山繪成山脈，惟將山散放圖中，不繪成山脈。但是，康熙時期的地圖繪有山脈，也惟有康熙時期的地圖中是如此。乾隆以後，複製地圖時，山僅繪一座一座，不成山脈，因此，康熙時期繪製的地圖為上乘。這也是利用西洋人的結果」。內藤在文中附帶介紹自己在北京發現有關滿洲、蒙古方面地圖後，摹寫輿圖的逸話。續而又介紹了為錄入地名，徹夜不眠，花費三四天，盡悉抄錄帶回日本的事情。由此也不難想像當年內藤湖南對輿圖資料情有獨鍾的一面。早在1910年9月至10月間，由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派遣內藤等三位教授、富岡等二位講師，到北京學部調查敦煌發掘的古書以及內閣傳來的古書。時年內閣古書還未曾整理，經許可初次開箱目睹了宋、元板古籍。當時，閱覽了十多箱書籍，除珍本古書外，其中就有輿圖資料。譬如內藤記錄了以下幾幅輿圖：《明代雁門關寧武關邊垣圖》、《明代東路邊垣圖說》、《明代甘肅鎮戰守圖略》、《大清一統志稿本》、《清漢字甘肅圖》、《浙江五府分圖》等。並介紹照像以及複寫興安嶺地方、喀爾喀地方、哈密地方三幅圖帶回日本的經緯。高度評價這些輿圖的研究價值。詳情參看《目睹書潭·清國派遣教授學術視察報告（狩野・小川・濱田・富岡諸位合作）》（《內藤湖南全集》，第12卷，頁188-211）。在該文末尾附有內藤閱覽京師圖書館圖書，親筆抄寫的書目，即《京師圖書館目睹書目》。參看上引書，頁209-211。

<sup>9</sup> 當年除奉天故宮收藏輿圖之外，盛京將軍衙門也藏有不同種類的輿圖或圖畫資料。光緒年間，盛京將軍衙門收藏輿圖和戰圖的情況，參看《盛京典制備考》（光緒四年（1878）刊）卷1，將軍衙門恭儲「乾隆四十四年奉到《皇輿全圖》一百零三篇，《回疆一帶得勝圖》三十四篇，乾隆五十一年奉到《金州全圖》十六篇，盛京全圖二軸；乾隆無十五年又奉到《臺灣戰圖》十二篇，《安南國戰圖》六篇；嘉慶五十六年奉到《臺灣戰圖》十二篇，《廓爾哈戰圖》八篇八摺，《安南國戰圖》六篇六摺；嘉慶十年奉到《雲貴戰圖》一分四篇，《湖南戰圖》一分十六篇」。

<sup>10</sup>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冊，頁534。

文輿圖，但對西伯利亞輿圖繪製的工作及對康熙時代的黑龍江地區繪製輿圖同步而行的敘述，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康熙時期出現的全國大地測繪和滿文輿圖繪製問題。<sup>11</sup>

1930年，德國學者福克司在北平國立文獻館查閱各類輿圖。1937年，他的調查結果發表在*Imago Mundi* 上。該文介紹了國立文獻館庋藏的珍貴輿圖轉移到上海的原委。並提及當時北平還存有輿圖一百五十件左右的事情。福克司從這些圖中挑選頗感興趣的有關中國北方地區的幾幅輿圖，並對其進行研究，提出中國曾計劃繪製東北各地輿圖，進一步明確指出繪製的這些輿圖和俄羅斯繪製的輿圖之間，互有影響的問題。進而說明了中俄兩國在輿圖交流史方面，有過相互影響的重要問題。<sup>12</sup> 惜福克司當時未能全面調查國立文獻館的輿圖，也沒有具體利用俄羅斯方面的輿圖資料進行比較研究。但他指出的問題，直到今天也具有很深遠的歷史意義。

1933年，福克司在日本的《滿洲學報》第二期發表了一篇有關滿文地圖的專論，重點介紹了包括西伯利亞東北部的幾幅滿文地圖。<sup>13</sup> 通過比較滿文輿圖中的勒納河（Liyana bira）形狀和俄羅斯的果都諾夫（Godunov）繪製西伯利亞地圖，提出了兩者有關聯的問題。福克司利用上述1914年稻葉君山在《清朝全史》中利用的〈康熙初年滿洲地圖〉，附圖詳述其內容，並解讀了部分滿文地名，福克司在文中附有滿文輿圖黑白照片，題名為〈1690年左右東北亞地圖〉，首次提出該圖約繪製於1690年的問題，值得參考。福克斯在這篇論文中還分別論述了其他幾幅滿文輿圖的概要和地名考釋。他的研究無論從解讀滿文輿圖的方法，還是從地名資料的證引方面，也都為研究滿文輿圖提供了一個楷模。

1935年，日本學者和田清在《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蹟輿圖》<sup>14</sup> 中，專述滿文輿圖研究的重要價值。該文提及作者曾通過藤田博士得知羅振玉藏有一部分滿文東北地圖的事情。

另外，和田清介紹1908年白鳥庫吉在東北考察時，在浦鹽斯德（即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昔稱海參崴）的東方學院圖書館發現滿漢文歷史地圖的經過。該圖由白

11 В. Бартольд (1925)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 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институте живых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12 Walter Fuchs, “The Peking Map Collection,” pp. 21-22.

13 Walter Fuchs, “Ue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頁1-18。日文梗概參看上引書，衛藤利夫抄譯，《滿文地図に就いて要約》，頁1-3。

14 大連圖書館藏，社團法人滿洲文化協會於昭和十年（1925）刊行複印本。

鳥庫吉費時十餘天抄寫攜回日本。後來和田清借出自鳥庫吉手繪地圖，經對照發現浦鹽斯德東方學院的地圖就是《盛京等處標記戰蹟輿圖》。此圖後來在《滿洲歷史地理》中以《盛京輿圖》為題徵引。該圖亦可視為《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等處標註戰蹟輿圖》（和田清稱《盛京等處標記戰蹟輿圖》）的抄本。這也說明了日本學界早就開始關注滿文輿圖的一段歷史。和田清在文中進一步介紹當時奉職於奉天醫科大學的福克司研究羅振玉所藏地圖的成果。指出還有其他輿圖存世的問題。通過福克司的研究，和田清也得知除北平故宮博物院外，奉天故宮亦各藏一部《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等處標註戰蹟輿圖》，預言今後會有新的輿圖相繼發現。<sup>15</sup> 同一時期，中國的王庸也已開始編輯出版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輿圖目錄，其中就包括了許多滿文輿圖，但此時並沒有對滿文輿圖內容進行深入研究和解讀。<sup>16</sup>

1937年，當時的滿日文化協會及滿鐵新京圖書館主持舉辦了東洋古地圖展覽，並發行了《建國五週年紀念 東洋古地圖展覽會陳列目錄》（圖3），該目錄分漢文之部和洋文之部，共陳列出一百二十八件地圖，其中包括滿文以及滿漢合璧地圖。除此之外，還有個別俄文地圖。出品機構和人員包括當時的大連、奉天、新京、哈爾濱各滿鐵圖書館、國立文化院、滿日文化協會、黑田博士等各機關和個人。展覽會先在當時的滿洲國首都新京舉辦，後於同年三月十五日，在奉天國立博物館繼續舉行了一周的展覽。<sup>17</sup>

1962年，福克司在日本京都大學地理學史研究會主辦的《地理學史研究》第二期發表了由織田武雄譯成日文的〈北京の明代世界図について〉一文，首次介紹了滿文〈大明混一圖〉的概要，並附有〈大明混一圖〉全圖和〈大明混一圖之中國西南部和印度半島〉黑白照片。指出此圖和1402年在朝鮮繪製的中國輿圖〈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以及天理圖書館所藏〈大明國圖〉、日本熊本縣本妙寺所藏輿圖出於同一類型。進一步推定〈大明混一圖〉即為《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中的〈清字簽一統圖〉。<sup>18</sup>

15 和田清，〈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蹟輿圖〉。關於此圖的滿文、漢文地名索引參看今西春秋，〈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蹟輿圖〉，頁220-268。

16 王庸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新購輿圖目錄〉。

17 《日滿文化協會關係雜件・設立關係附本邦ヨリ服部博士外8名渡満》(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錄，H門 東方文化事業，6類 講演、視察及助成)，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18 Walter Fuchs, "Notiz zur Pekinger Weltkarte der Ming-Zeit," pp. 1-2. 日譯文參看織田武雄，〈北京の明代世界図について〉，頁3-4。除此之外，福克司還研究介紹了朱思本和廣輿圖，參看Walter Fuchs,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另外，〈清字簽一統圖〉在 Walter Fuchs, "Ue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 p. 15 中

1963年，船越昭生撰文《康熙時代のシベリア地圖—羅振玉舊藏地圖について—》，高度評價羅振玉舊藏地圖是「對未知的土地東北亞一角進行有組織的探險、測圖活動展開之前的產物，顯示了科學的地理認識飛躍的過渡階段」，並進一步說明「這在中國地圖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並非是繼承宋、明兩朝正統的中國地圖的傳統、也不顯示出元朝地圖及其影響下的西亞、朝鮮等地理知識相互結合的地圖要素。也看不到中華世界的特色，更是難以發見同耶穌會士製作的各種輿圖簡單結合的要素」。船越經考證推定此圖繪製於1673-1676年之間，進一步指出該滿文輿圖是在耶穌會士南懷仁（F. Verbiest）參與之下繪製而成的問題。<sup>19</sup>

此外，1964年，船越昭生在〈ウイットセンの北東アジア地図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一文中專門探討尼古拉斯·威特森（Nicolas Witsen）亞洲東北部地圖，提及上述福克司於1933年介紹過的滿文〈1690年左右東北亞地圖〉，並提出無論從陸地輪廓還是從勒納河走向特徵，都顯示出同俄羅斯的果多諾夫圖有類似的要素，對福克司提出的1689年繪製一說提出質疑。船越昭生經研究提出繪製年代應為1674到1676年。<sup>20</sup> 船越論文旁徵博引，利用了不少中外輿圖資料，但是，未能舉出和滿文〈1690年左右東北亞地圖〉直接相關的資料，許多問題還處於推測階段。此圖後來下落不明。1980年吉田金一撰文研究該圖，推定繪製年代為1690年左右，支持福克司之說。<sup>21</sup> 經吉田介紹該圖後，1986年，劉遠圖寫信告知吉田，此圖當時收藏在大連博物館。<sup>22</sup> 這幅滿文輿圖，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討論，最終還未能全部解開最重要的地理知識來源以及繪製途徑等最基本的問題。

1964年，鴛淵一利用〈盛京輿圖〉（即《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蹟輿圖》）專門對《滿文老檔》中出現的地名進行了一番深入研究，1979年發表其研

---

已經提及，但此時還沒有指出該圖就是〈大明混一圖〉的史實，到了1962年才正式提出〈大明混一圖〉一說。最近專研〈大明混一圖〉的論著，參看汪前進、胡啟松、劉若芳，〈絹本彩繪大明混一圖研究〉，頁51-55。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511-512，劉若芳、汪前進，〈《大明混一圖》繪製時間再探討〉，頁329-355。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頁285-293。

- 19 船越昭生，〈康熙時代のシベリア地圖—羅振玉舊藏地圖について—〉，頁199-218。
- 20 船越昭生，〈ウイットセンの北東アジア地図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
- 21 吉田金一，〈郎談の吉林九河圖とネルチンスク條約〉，頁31-70。中譯見劉顯叔譯，〈郎談〈吉林九河圖〉與尼布楚條約〉。劉遠圖不同意福克司和吉田金一把羅振玉舊藏滿文輿圖的成圖時間定在1690年。劉遠圖稱「羅振玉舊藏地圖應是1685年之後，1689年之前的作品。與同時期俄人繪製的西伯利亞地圖相較，羅振玉舊藏地圖也談不到受俄國地圖的影響。」參看劉遠圖《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頁67。
- 22 吉田金一，〈ロシア与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ンスク條約の研究—〉，54頁。

究成果。為利用滿文檔案研究東北歷史地理提供了一個範例。這篇文章至今也是研究大清國入關前歷史地理方面研究的必讀之作。<sup>23</sup>

1973年，著名地圖學者列奧·巴格羅夫（Leo Bagrow）介紹了滿文巡幸圖和蒙古文地圖各一幅，<sup>24</sup>惜未對圖內語文進行細緻解讀。但這些都或多或少也說明了中外各界輿圖研究人員，始終在關注滿文輿圖獨有的研究價值。

通過以上簡要回顧也可以看出，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滿文輿圖研究方面幾乎是個空白，這一狀況從八十年代以後逐漸有所轉變。

1980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工作的鞠德源在〈關於明代奴爾干永寧寺碑記的考察和研究〉一文中，介紹了滿文輿圖《黑龍江流域圖》（鞠德源稱為《胡爾哈河入海圖》），<sup>25</sup>據介紹此圖為康熙朝繪製滿文圖，「該圖係用高麗紙墨繪而成，接一卷，後被修裱者分裱成二十小幅，並誤題為《黑龍江流域圖》，圖幅高三十五公分，每幅長短不等，合計總長二十一點九二公尺。此圖從胡爾哈河（今稱牡丹江口）中游及布爾哈土城、尼堪城畫起，一直畫到混同江口（即黑龍江口）和東海」。<sup>26</sup>該滿文地圖共二十幅，鞠德源附兩幅原圖黑白圖片，介紹了其中的第一幅、第十九、二十幅的局部。並推斷此圖繪製時間可能是在順治十年（1653）前後。<sup>27</sup>但是，有關該系列滿文輿圖，至今還不見有人全面介紹和研究。<sup>28</sup>

同年，吉田金一利用滿文《吉林九河圖》研究了該圖和尼布楚條約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給中外學界帶來了利用滿文輿圖探討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考意義。<sup>29</sup>吉田

23 鶴淵一，〈滿文老檔による盛京輿図の歴史地理的研究〉（其1、2、3），頁117-199。

24 西伯利亞地圖研究，參看 Leo Bagrow, *The Atlas of Siberia by Semyon U. Remezov*；論及滿文及蒙古文的著作參看 Leo Bagrow und R. A. Skelto, *Meister der Kartographie*, pp. 435-438. 滿文圖標有漢文貼簽，為1760年，疑為皇帝巡幸圖。蒙古文地圖為1734年準噶爾時期的輿圖。該書在介紹亞洲地圖時，除中文輿圖外，專設一節滿文以及中亞輿圖部分，專門論及滿洲輿圖和準噶爾蒙古輿圖。介紹列奧·巴格羅夫（Leo Bagrow）的地圖學研究，參看石山洋，〈列奧·巴克羅夫的地圖學史研究〉，頁27-54。

25 鞠德源，〈關於明代奴爾干永寧寺碑記的考察和研究〉，頁64-90。

26 同上註，頁66。

27 同上註，頁67。

28 中俄關係研究中，介紹輿圖的論文參看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ズスク条約の研究——》，頁51-65。中俄邊界問題專題研究，參看劉遠圖，《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最近研究有關18世紀西伯利亞地圖論文，參看 Shinobu Yamada-Komeie, “Mapp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Cartograph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akhalin, the Kurils, and Japan in the 18th century,” pp. 55-65.

29 吉田金一，〈郎談の吉林九河圖とネルチズスク条約〉，頁31-70。〈ネルチズスク条約で定めた清とロシアの国境について〉，頁62-87，以及《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ズスク条約》。

的研究發表之後，學界開始矚目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輿圖資料。但是，現在看來其研究內容存在很大的問題，尤其是推斷《吉林九河圖》為簽訂尼布楚條約參照地圖之說，讓後來不明該圖真相的國內學者，深信不疑，附會之說隨處可見。很多討論邊界問題或者界碑問題的論著，都以吉田研究為基礎，立論陳說，可見其影響之甚。<sup>30</sup>

1993年，薛虹利用1948年在吉林購入的一幅〈滿文黑龍江地圖〉，討論中俄早期交涉過程中涉及的格爾必齊河位置問題，據介紹該圖有五百四十一處地名，根據記載的地名、驛道以及建置，推定該圖為道光初年繪製。<sup>31</sup>惜該文未附原圖資料，從文末繪製的圖1〈東北師大歷史系收藏黑龍江形勢圖（局部示意）〉，我們無法窺知原圖的形制和繪法。

1997年，松浦茂利用滿文《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sup>32</sup>介紹了九路「調查」的經過，但因其主要以黑龍江北岸「調查」為視點，且在考述康熙二十九年（1690）察邊問題時，以康熙五十年重新繪製的《吉林九河圖》為據，故許多問題還有必要重新探討。所以，可以說結合輿圖資料和檔案資料，全面介紹康熙時代的察邊問題，還有必要進一步繼續深入探討。<sup>33</sup>除此之外，2007年，吳雪娟著有《康熙滿文本《九路圖》與清代巡邊制度研究》（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一文，該文利用滿文檔案和輿圖資料，詳論有關巡邊問題。遺憾的是該文也和吉田金一、松浦茂同出一轍，以為此圖繪製於康熙二十九年，且該文也沒有參照松浦茂十年以前就曾論及的相關問題。<sup>34</sup>

2001年，盧雪燕以〈院藏康熙滿文本《黑龍江流域圖》考介〉為題，專門介

30 劉遠圖，《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

31 薛虹，〈彩繪滿文黑龍江地圖和格爾比齊河的位置〉，頁1-10，59。（後該文收入《薛虹學術論集》，頁371-382，但未收錄原刊三幅示意圖）。文中論及一幅〈彩繪滿文黑龍江地圖〉，此圖由薛虹於1948年在吉林省購入，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藏。縱125cm，橫100cm，紙質，滿文由劉厚生提供漢譯，但不見滿文轉寫地名等資料。

32 簡要介紹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的文章，參看吳雪娟，〈館藏《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的價值分析〉，頁25-26。楠木賢道，〈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からみた康熙23年の露清關係〉，頁29-82。後者對康熙二十三年滿文檔案及中俄交涉綜合論述之後，附有滿文27件文書的羅馬字轉寫和日譯文，這些方法有利於讀者了解滿文檔案的語言風格。

33 松浦茂首次介紹有關滿文資料時，利用日文「調查」一詞。原滿文檔案中為tuwaname genembi（視察），並未用滿文baicambi（調查）一詞，故中文譯為「視察」為宜。參看松浦茂，〈ネルチンスク條約直後清朝のアムール川左岸調査〉，頁76-106。後收入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數民族》，頁1-40。以下略稱松浦茂（1997）。

34 有關《吉林九河圖》筆者將另外撰文介紹其繪製原委。

紹了滿文輿圖，再次引起學界矚目。<sup>35</sup> 其後，2006年，孫喆發表了〈從兩幅地圖看十八世紀初期清人對黑龍江流域的認識〉為題名的論文，重點介紹《黑龍江流域圖》和《皇輿全覽圖》（《黑龍江源圖》、《黑龍江口圖》、《黑龍江中圖》）的相互關係，推出《黑龍江流域圖》繪製時間為「大概是在康熙三十一年至康熙四十八年之間」，並進一步推測此圖可能就是傳教士測量成果。<sup>36</sup> 目前，我們還看不到傳教士利用這些輿圖的資料的相關檔案等佐證資料，推出這一論點為時尚早，有些問題還需要今後進一步深入探討。

多年來，筆者在查閱中外各地所藏滿文檔案文獻的同時，多方收集滿文輿圖相關的檔案資料。2007年撰文〈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結合同一時代的滿文檔案資料，介紹此圖繪製的歷史背景和繪製過程，闡明了此圖是在編纂《大清一統志》過程中，調查黑龍江將軍轄區山川河流之後繪製而成的具體問題。<sup>37</sup> 筆者今後將陸續介紹有關滿文輿圖在研究大清國歷史上的意義。

自內藤湖南到至今的滿文輿圖研究，其內容基本都以歐亞東北部為主，這也很容易造成一種誤解，即以為繪製的滿文輿圖基本以東北部為主。目前公開能夠閱覽的滿文輿圖，還不足以回答這些問題。有一點可以肯定，滿文輿圖除大清國統治的東西南北各地之外，也繪有各類世界輿圖，以稿本、草稿、抄本、刊本等形式流傳分藏世界各地。

2003年，郭美蘭以〈熱河地圖 清宮珍品〉為題，介紹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木蘭圍場和避暑山莊圖。據介紹，該館藏有關圖共二十餘件（冊），百餘畫幅，形成時間起自康熙年間，最晚至民國。文種除漢文以外，還有少數滿文或滿漢合璧圖。對這些圖的分類介紹，有助於了解第一歷史檔案館現藏各種輿圖的圖樣類型。

其後，2005年，郭美蘭在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主持召開的輿圖國際會議上，以〈清宮珍藏滿文輿圖〉為題演講，專門談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滿文輿圖。據介紹該館現有約近三百件（冊）滿文輿圖。文種有滿文、滿漢合璧、滿蒙合璧、滿藏合璧、滿俄合璧等，也對館藏多幅輿圖分類，詳細講述了滿文輿圖的繪

35 《故宮文物月刊》，19卷9期，頁96-109。

36 《中國地方志》，第6期，頁55-60。

37 《黑龍江流域圖》的繪製背景及其繪製過程，參看承志，〈満洲語で記された『黑龍江流域図』〉，頁195-222。

製特點和內容。<sup>38</sup>

從以上的簡單回顧也可以看出，中外學者始終有人在關注滿文輿圖。通過已往的這些研究，我們還遠遠不能窺見整個滿文輿圖的全貌。雖說迄今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滿文輿圖數量有限，隨著滿文輿圖和滿文檔案資料的進一步公開出版，這一問題必將會得到進一步深入研究。滿文輿圖研究可以說剛剛起步，無論在利用輿圖資料方面，還是在挖掘利用新資料方面，都有必要今後繼續進行廣泛深入的調查和研究。<sup>39</sup>

本文探討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滿文《烏喇等處地方圖》，就是試圖填補這方面的空白的一個嘗試。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為行文方便，本文採用了P. G. von Möllendorff,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 Shanghai, 1892，羅馬字轉寫方式。正文以及引文內滿文地名、人名、圖名的起首文字採用了大寫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原滿文字母無大小寫之區別。

## 一、《烏喇等處地方圖》圖名

1932年，在王庸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十九）滿洲」類中，介紹了十幅有關大清國東北方面的輿圖。其中「（一六五）烏喇等處地方圖二幀〔青綠畫，滿文，紙本，75〕」中，附有說明如下：

二幀圖畫不同，似非出一人手。舊目「稱康熙三十二年畫本」地名以紅簽註滿文。一幀之背，貼有一白紙字條云「郎坦送來九大人圖一幅，庫內取來烏喇等處圖一幅，纂修滿丕畫來圖一幅，三幅共包一處。」九大人圖為本目中「口外各路滿文圖」六幀之一。滿丕所畫，不知何圖。惟庫內之「烏喇圖」只稱一幅，不知是否以兩幀為一幅，抑兩幀之一，來自庫內而其一即滿丕所畫。因在該字條之上方又記有「編纂滿丕出差畫

38 2005年3月18日，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國際輿圖會議。

39 最近的蒙古繪畫以及輿圖研究，參看小長谷有紀、楊海英編著，《草原の遊牧文明—大モンゴル展によせて》。最近的蒙古文地圖研究參看Futaki Hiroshi and Kamimura Akira (eds.) *Landscapes Reflected in Old Mongolian Maps*. 楊海英，〈清朝時代伊克昭盟盟長バダラホの奏凱図—『圖開克跡』が描くオルドス七旗—〉，頁626-657。

來輿圖」字樣也。至於此字條之來源，殆亦一統志館所寫貼。<sup>40</sup>

簡明扼要的附記，其實，道出了《烏喇等處地方圖》流傳的歷史，也為我們提供了相關的繪製年代以及繪製輿圖相關的歷史人物、機構等問題。《烏喇等處地方圖》一幀紙背貼寫的白紙字條三幅圖，即《郎坦送來九大人圖》（一幅），《烏喇等處圖》（一幅，庫內取來），《纂修滿丕畫來圖》（一幅）。三幅共包一處，也說明三幅圖有可能在同一處保管。正如王庸附言，這些輿圖和一統志編纂館有關。事實上，通過康熙時期的有關滿文檔案，證明這些圖就是當年編纂《大清一統志》時，對黑龍江、吉林等地人文地理狀況進行的數次調查有直接的關係，在內閣一統志館提供給黑龍江將軍的資料中，就包括有上述滿文輿圖的記載。<sup>41</sup>

當然，這些輿圖目前究竟以什麼題名保存在何地，這也是本文首先要說明的一個基本問題。以下就針對輿圖名稱以及流傳情況進行簡要介紹。

眾所周知，國立北平圖書館（原址位於北平文津街）前身為宣統二年（1910）成立的京師圖書館，民國十七年（1928）合併北海圖書館，改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當時圖書館分設總務、採訪、編纂、閱覽、善本、期刊、輿圖、金石八個部門。其中，輿圖部收藏新舊輿圖二百幅。<sup>42</sup>

王庸編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新購輿圖目錄》，即為原京師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藏輿圖一百餘種圖之目錄。這些輿圖分別有民國七年（1918）四月和民國十五年（1926）十一月編訂的目錄。因七年本所記較詳，王庸編目稱之為舊目。從附記中的舊目「稱康熙三十二年畫

40 王庸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新購輿圖目錄〉，頁45-72。（後以《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於1934年出版）。此外，國立北平圖書館輿圖資料參看王庸、茅乃文編，《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和《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續編》等輿圖目錄。1931年王庸由陳寅恪介紹出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兼輿圖部主任。參看李小文，〈王庸先生和他的著作〉。中國國家圖書館還藏有國立北平圖書館南京辦事處編，《國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油印本，1946年，1冊，附新購特藏輿圖目錄，惜原文未寫明，俟查。

41 《黑龍江檔》16-21《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來文抄檔》正月初四日卜魁驛丁齊闢寶遞送文書記載Langtan sei nirufi gajihua uyin jugün i nirugan（《郎談等繪製後帶來九路圖》），該圖即為王庸所標註的《郎坦送來九大人圖》。此外，《黑龍江檔》16-24《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龍江副都統、墨爾根城協領、索倫總管、驛吏行文抄檔》一月初七日令領催阿爾都哈（Alduha）遞送文書也有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baicafu gajihua nirugan（《原任內大臣郎談等勘察後帶來圖》）、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sei nirufi gajihua nirugan（《原任內大臣郎談等繪製後帶來圖》）也有相關圖名出現，均指同一幅圖。（凡本文引用檔案全宗《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時，前一《 》號內為檔案全宗名略稱，數字16-21表示膠卷編號及拍攝順序號，後一《 》號內為冊檔全文名稱，以下《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亦同，不另註明）。

42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北平ニ於ケル國立重要學術機關》。

本」來看，《烏喇等處地方圖》亦可能有康熙三十二年繪製本。民國七年四月編訂的輿圖目錄中有此年代記載，該目錄目前還未曾寓目。

王庸的目錄出版後，1933年出版了李德啓編《國立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滿文書籍聯合目錄 Manju bithe cagan i fiyelen i ton》（國立北平圖書館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合印），該目錄中記《烏喇等處地方圖》名稱如下：

烏拉等處地圖；滿文

ula i jergi ba i nirugan (補譯)

二幘 青綠畫紙本

長132公分，寬110公分；長115公分，寬87公分

漢文題名缺「方」字，滿文為李德啓「補譯」。其補譯的滿文《烏拉等處圖》，其實就是王庸目錄的滿文《烏喇等處地方圖》，只是增補譯寫了滿文題名和輿圖尺幅。除此之外，在《國立北平圖書館存箱目錄》（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打印稿，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中登記為「圖六箱（15幅）」其具體內容如下：

烏喇等處地方圖二幅 清代滿文紙本彩繪 134×112 116×88.5公分 北平<sup>43</sup>

上述各目錄之中，輿圖尺幅記載稍有區別，均指兩幅《烏喇等處地方圖》。此圖自從王庸介紹以來，一直未為研究人員提及，迄今也不見任何專論。從舊目記「庫內取來烏喇等處圖一幅」來看，此圖來源應該是內閣大庫所藏資料的一部分輿圖。<sup>44</sup>從康熙年間檔案記載來看，該圖藏於內閣一統志編纂館。

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清宮最早的輿圖目錄《天下輿圖總摺》（康熙朝）記載了相關的圖目：

康熙參拾壹年陸月貳拾伍日，郎潭交來烏拉寧古塔口外大小圖伍張

43 「圖六箱」除《烏喇等處地方圖》外，還了包括《黑龍江流域圖》和《吉林九河圖》。當時北平圖書館裝箱整理放在一箱，也證明原先這些圖都基本在同一處的事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輿圖的詳況，參看盧雪燕，〈地理之學·非圖不明——故宮所藏古地圖探微〉，頁109-124。李孝聰，〈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代輿圖的初步整理與認識〉，頁151-174。

44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目錄》，頁1-2。〈前言〉記載「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為防不測，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和逐年購得的特藏地圖隨大批文物運往南京。其後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時，將300餘種8大箱輿圖運至臺灣，存於臺北中央圖書館」。有關輿圖箱數，各資料記載有所不同，如《文獻叢編》第32輯（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存滬文物點收事項記載為「輿圖十六箱」。運抵臺北後整理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存箱目錄》（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打印稿，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登記來看，共18箱，圖共（幅、卷、冊）817件，其餘還有8件未列入該目錄之圖。

康熙肆拾柒年正月拾貳日，奉旨交來烏拉圖貳張<sup>45</sup>

以上輿圖，目前還不能知道繪製內容。郎潭，即郎談、郎坦，皆為滿文 Langtan 的漢字異寫，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世代為內大臣。<sup>46</sup>《天下輿圖總摺》中記載的郎談交來的五張圖，目前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滿文輿圖是否有什麼關係，還需進一步調查研究。本文論及的《烏喇等處地方圖》究竟是否和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二日交來的圖有關，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論證。

目前，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兩幅《烏喇等處地方圖》，具體整理編號如下：

(1) 烏喇等處地方圖 平圖021453

(2) 烏喇等處地方圖 平圖021454

本文僅探討(1)圖，有關(2)圖將另外撰文討論。以下內容均以(1)圖為主展開討論。

有關《烏喇等處地方圖》的圖名，在乾隆年間編纂的輿圖房輿圖目錄《蘿圖薈萃》中亦不見其名，也許這些圖當時不屬於內務府輿圖房。從該輿圖記載的滿文內容來看，該圖為寧古塔將軍轄區圖。內容和目前的題名也沒有直接的關係。亦非「烏喇」地方圖，唯「烏喇」原為滿文ula的漢字音寫，意為「江河」。此圖描繪內容以黑龍江下游以北為主，主要描繪的內容以江河(bira ula)為主，這也許是後來圖名題為《烏喇等處地方圖》的一個緣故。

2008年1月，有幸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之邀，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郭美蘭女史一起解讀《烏喇等處地方圖》原件滿文，發現原圖並無圖名。也進一步證明此圖漢文題名為後來整理者題寫而成。

據康熙四十九年滿文檔案記載，此圖一般有如下四種稱呼：

(1) gūsai ejen bihe bahai nirufi gajiha nirugan (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帶來圖)<sup>47</sup>

(2) gūsai ejen bihe bahai sei nirufi gajiha nirugan (原任都統巴海等繪製後帶來

45 《天下輿圖總摺》。

46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3，〈郎談傳〉（滿文，頁 38b-39b；漢文，頁 3888）。

47 《黑龍江檔》16-25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寧古塔將軍、伯都訥副都統、土謝圖親王、扎薩克圖郡王、索賚特、杜爾伯特答文抄檔》（九月二十二日）是日令筆帖式散珠（Sanju）遞送文書。

圖)<sup>48</sup>

(3) gūsai ejen bihe bahai nirufi benjihe nirugan (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sup>49</sup>

(4) bahai i nirufi gajihā nirugan (巴海繪製後帶來圖)<sup>50</sup>

這四種稱呼有些微的差異，都是指同一張滿文輿圖。當時的圖名譯成漢文為《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帶來圖》，由此來看，我們要討論的《烏喇等處地方圖》圖名，也確實為後來的整理人員或編目者擬定而流傳至今。<sup>51</sup>

為了證明不同名稱的滿文輿圖是指同一張輿圖的事實，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提出具體的繪製背景和繪製過程、圖名考訂等問題。

首先，本文以介紹鮮為人知的黑龍江以北地區的歷史入手，探討大清國對該地區的統治過程和地理知識的彙纂過程。然後進一步介紹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後，康熙二十九年兵分九路視察黑龍江以北各地山河的具體經過和繪製輿圖的問題。為此，利用滿文檔案詳細介紹康熙二十九年視察隊伍的編隊情況，揭示本文探討的《烏喇等處地方圖》和寧古塔將軍巴海率領的九路視察隊伍之間的關係，提出巴海等三路視察隊伍親臨黑龍江下游以北的亨浪河、兔乎魯河流域等地後繪製《烏喇等處地方圖》的事實。此外亦利用滿文檔案，依據檔案文書描述的《烏喇等處地方圖》內容，證明檔案文書內記述的輿圖內容和我們所要討論的輿圖內容的一致性，斷定兩者為同一輿圖的事實。最後，利用各種輿圖資料和第一手新發現的檔案文書及中外編纂資料，考訂圖內地名用字變化等歷史過程。

## 二、《烏喇等處地方圖》繪製的歷史背景

黑龍江流域，早在努爾哈齊的天命年間，就已進兵這些地區，招撫黑龍江週邊各部。更具體的將各部編制為八旗基層牛角組織的時期，主要是天聰以後展開具

48 同上。

49 同上，十月二十一日令驍騎校卓魯庫 (Jolkū) 遞送文書。

50 《黑龍江檔》16-21《康熙四十九年一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來文抄檔案》八月二十三日由齊蘭寶 (Cilamboo) 遞來文書。

51 目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將此圖登錄為《烏喇等處地方圖》(平圖 021453、平圖 021454)。東北方面的滿文地圖，在鄧衍林《中國邊疆圖籍錄》(頁 116-119) 中，有《吉黑兩省地圖》、《黑龍江圖》、《黑龍江全圖》等輿圖。

體收編工作。譬如，天聰四年（1630）十一月，即由承政兼梅勒章京宜蓀（Isun）奉命副左翼主帥薩木什喀（Samsiha）等率兵遠征索倫部落（Solon i aiman），大獲全勝，攜來大量戶口。天聰五年（1631）三月，又遠征虎爾哈部落（Hūrha aiman），攻取兀庫爾城（Ukur hoton）等地，進兵鐸陳（Duwecen）等地。<sup>52</sup>到了崇德二年（1637），滿洲正紅旗大臣葉克舒（Yekšu）率師遠征黑龍江，擊敗博穆博古里（Bombokur），攻取雅克薩城（Yaksa hoton），進至薩哈爾（Sahar）地方，俘獲男子六百四十名，家口一千七百二十名，馬一百五十六匹，牛一百四隻。<sup>53</sup>

崇德三年（1638）五月，索倫部落三百三十七戶，男子四百八十人來降。太宗特命尼堪（Nikan）及每旗擺牙喇甲喇章京各一員，率每牛彖擺牙喇各一人，攜繩綬、素綬、梭布前往迎索倫部落來降人員三百三十七戶，男子四百八十人，賞賜無數，在外藩蒙古郭爾羅斯部落（Tulergi goloi monggo gorlos gurun），於吳庫馬爾（Ukūmal）、格倫（Geren）、額勒蘇（Elesu）、昂阿插喀（Anggacaka）地方，駐扎耕種，任其移營。並視其中有能約束悖亂，堪為首領者，授為牛彖章京，分編八個牛彖而歸。<sup>54</sup>這也是原先屬於蒙古領民（Harangga）的索倫部（Solon aiman）編入牛彖之始。

崇德七年（1642）閏十一月，滿洲鑲白旗人朱馬喇（Jumara）同沙爾虎達（Šarhūda），往征松花江（Sunggari giyang）、虎爾哈部落，招降喀爾喀木（Kalkamu）、遮克特庫（Jekteku）、塔土庫（Tatuku）、福提希（Futihi）、俄爾渾（Orhon）、窪齊奇（Waciki）、庫巴查喇（Kūbacara）、額提奇（Etiki）、薩里（Sali）、尼野爾北（Niyerbe）十屯（gašan）人民，共計男子五百三十四人，婦女幼小九百二十四人。<sup>55</sup>

崇德八年（1643）三月，滿洲鑲白旗哈寧阿（Haningga）同蠶章京阿爾津（Arjin），往征虎爾哈部落之黑龍江（Sahaliyan ula），<sup>56</sup>獲波和里（Bohori）、

52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9，〈宜蓀傳〉（滿文，頁 6a-6b；漢文，頁 3981）。

53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7，〈葉克舒傳〉（滿文，頁 14a-14b；漢文，頁 3957）。

54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9，〈尼堪傳〉（滿文，頁 44b-45a；漢文，頁 3992）。

55 《清太宗實錄》，卷 63，崇德七年閏十一月己酉。

《八旗通志初集》，卷 160，〈朱馬喇傳〉（滿文，頁 6a；漢文，頁 3997）。

56 滿文為 jakūci aniya ilan/ biyade, tui janggin arjin i emgi hūrha aiman i/ sahaliyan ula be dailanarde。據滿文原文，漢譯文應為「往征虎爾哈部落之黑龍江」。故不從《清太宗實錄》卷 64，崇德八年三月庚戌記載的「往征黑龍江虎爾哈部落」。該處實錄漢譯文有誤，依滿文實錄原

諾爾噶爾（Norgal）、都里（Duli）三處（gašan）男子七百二十五名，小噶爾達蘇（Ajige kaltasu）、大噶爾達蘇（Amber kaltasu）、綽庫禪（Cokūcan）、能吉爾（Nenggil）四處（gašan）歸順男子三百二十四名，俘婦女幼小一百九十九口。獲馬三百十七匹，牛四百二頭，貂狐等皮張甚多。七月，率師凱旋。<sup>57</sup>

這些大規模的遠征和編入八旗牛衆的舉措，大大推動了大清國對這些地區的有效統治。原先蒙古帝國以來的各蒙古領地以及領民，逐漸收編為大清國的正規軍團——八旗成員的一部分，按照他們的生活方式，分別對遊牧、狩獵、農耕等集團進行整編，在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的情況下，對遊獵為生的索倫等部，逐漸開始編入牛衆，定期貢納一定數量的貂皮，並對其賞賜各類物品。

順治時期，俄羅斯人（羅刹）<sup>58</sup> 南抵黑龍江流域，並侵入呼馬爾河周邊地區，甚至在呼馬爾建築軍事要塞。順治十年（1653）為了防治俄羅斯南下，設置了防範俄羅斯（Oros）的前線基地——寧古塔昂邦章京和副都統，鎮守寧古塔等處，康熙元年（1662）改為寧古塔將軍，由巴海首任將軍。

康熙十年（1671）九月初三日，康熙皇帝出朝陽門，前往東北各地巡幸。同月二十八日，駐蹕牙克薩，遣侍衛往寧古塔，賜將軍巴海貂帽，貂袍、天馬皮掛、鍍金刀等物。<sup>59</sup> 同年十月初二日，駐蹕達溪達爾巴。寧古塔將軍前來朝見。初三日，康熙皇帝召見寧古塔將軍巴海入內，問寧古塔及瓦兒喀、胡爾哈人民風俗，諭曰：

瓦兒喀、胡爾哈人皆暴戾奸詭，卿其善布教化，以副朕綏遠至意。欽

文 (ilan biyai juwan nadan de) tu i janggin arjin, haningga se de/ janggin cooha be afabufi, hūrga i sahaliyan ula de cooha unggih，應譯為「(三月十七日) 命護軍統領阿爾津、哈寧噶等率將士，往征虎爾哈之黑龍江」，滿文無部落等字，亦不見黑龍江之虎爾哈 (sahaliyan ulai hūrga) 之語。由此亦可窺見漢文實錄譯文之錯訛，故徵引不可全信漢文實錄。另外，相關誤譯處參看《清太宗實錄》卷 65 崇德八年五月丁巳「往征黑龍江虎爾哈部落 (hūrgai sahaliyan 34b//35a ula de cooha genehe)」。漢文實錄訛譯處較多，故引證據典，需相互參酌。

57 《八旗通志初集》，卷 159，《哈寧阿傳》（滿文，頁 21a-21b；漢文，頁 3985）。有關太祖、太宗時代遠征松花江及黑龍江流域的研究，先人研究較多，參看阿南惟敬，《露清對立の源流》和《清初軍事史論考》，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國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ンスク條約の研究——》。中文著作可參看孫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傳》，頁 320-331。

58 羅刹，滿文為 Loca 或 Looca。羅刹出現在黑龍江流域時，滿文檔案兩種寫法並存，當時檔案一般均指活動在黑龍江南北各地的俄羅斯之領民 (Harangga) 為羅刹。值得注意的是，羅刹妖魔化，並趨向和惡魔同意並稱，基本上是以後來的漢文資料為主，滿文資料不見如此記載。滿文 Loca，漢文記作老掐、老槍、老插、老羌、羅叉、羅禪、羅刹、羅察等，本文據《康熙起居注》漢文本，記作羅刹。為方便期間，原文引用一般按原文記載記為羅刹，正文敘述用俄羅斯，以示區別。

59 《康熙起居注》第 1 冊，康熙十年九月二十八日，頁 4。

哉。<sup>60</sup>

皇帝如此面授機宜，爲的是管理教育好寧古塔各地居民。此時提出了俄羅斯屬民的問題。同月十四日，康熙皇帝親自召見寧古塔將軍巴海面諭曰：

朕向聞卿賢能，今侍朕左右，朕益知卿矣。飛牙喀、黑折雖服、然其性暴戾、卿當善為防之。尤須廣布教化，多方訓迪，以副朕懷遠至意。羅剎賊寇雖云投誠，尤當加意防禦，操練士馬，整備器械，毋墮狡計。至於地方應行大事，即行陳奏，毋得疑畏。卿膺邊地重任，尚其黽勉，以報朕知遇之恩。欽哉。<sup>61</sup>

這種耳提面命，其實也反映了康熙皇帝對寧古塔居民以及俄羅斯屬民在黑龍江各地出現的很多問題的憂慮。當時，巴海及時奏曰：

臣惟有欽奉綸音，拮據黽勉，以報殊恩。<sup>62</sup>

此後巴海積極整頓寧古塔各地部族，陸續編制新滿洲佐領，爲鞏固寧古塔邊防奠定了基礎。康熙十三年（1674）十一月三十日乙丑，巴海來京朝見康熙皇帝：

先是，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巴海等，以松阿里吳喇、諾羅河、吳蘇里吳喇、木倫等處居住墨爾折勒氏部落，因騎射閑〔嫋〕熟，投誠已久，自歸依以來，氣習漸改，頗守法制，將伊等族長、里長題授佐領饒〔驍〕騎校。至是，將軍巴海率墨爾折勒氏新編佐領四十員並佐領下人丁來朝。<sup>63</sup>

這是巴海率領當地新滿洲各佐領第一次前來拜見皇帝。他們在京城待到第二年。康熙十四年（1675）正月初四日癸亥：

賜鎮守寧古塔地方將軍巴海黑狐裘、貂鑲朝衣各一襲，墨爾折勒氏佐領札奴科、布克託等衣、帽、靴帶、弓箭、撒袋、鞍馬、緞疋等物。未時，上御保和殿，賜將軍巴海及札奴科等食畢，御觀德殿，命札奴科等射。<sup>64</sup>

一方面獎賞寧古塔將軍以及各新滿洲佐領頭目，另一方面，多方積極派人探查俄羅斯動靜。並不時派遣密探調查黑龍江北部地理狀況。其中，當時帶路嚮導（Gajarci）基本上是出身於當地的索倫、達斡爾以及鄂倫春，還有早年歸順

60 《康熙起居注》第1冊，康熙十年十月初三日，頁5。

61 《康熙起居注》第1冊，康熙十年十月十四日，頁6。

62 《康熙起居注》第1冊，康熙十年十月十四日，頁6。

63 《康熙起居注》第1冊，康熙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頁185。

64 《康熙起居注》第1冊，康熙十四年正月初四日，頁189。

的俄羅斯人。這些人對大清國掌握了解黑龍江以北的地理狀況起了很積極的作用。他們熟悉當地的地理環境，特別是黑龍江以北各地山脈河源，以及各地部族居住生活狀況。在前往探查之前，調查人員首先尋訪各牛衆耆老，探查此前是否有熟悉地理環境的人員，如有此等人員，將彼等偕同前往調查地細察。這些舉措使大興安嶺等地地理狀況進一步明確化，也為康熙二十年（1681）以後，遠征黑龍江以北地區，抗擊盤踞各地俄羅斯據點帶來了新的契機。

《康熙十五年烏拉吉林來文檔》四月十五日正藍旗特烏勒（Teole）牛衆領催吳爾吉查（Urgica）遞送文書內記載：

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副都統密咨都統白布善（Baibusan）、薩布素（薩布蘇、Sabsu）等，為知照事。二月兵部秘咨，惟寧古塔設置官兵，雖為專防羅剎事，亦為保護居住松花江之瓦爾喀（Warka）之民。現將松花江之民盡悉遷往寧古塔。餘剩之半戶之民，彼等收穫完畢之後一併攜來等語。除將此嚴飭各牛衆章京之外，交付副都統檜齊（Kuwaici）、都統等將糧食運畢之後、遣官兵一併攜來等。現內地未定，我等尋思如羅剎至松花江半戶之地，居住寧古塔之官兵，率遷移之章京以及人民，保護人民遷移。逆溯至黑龍江之格依克勒（Geikere）、赫哲（Hejen）等國之地，此地人民不耕不種，避走各地。即毋派軍隊前往。若軍進入黑龍江，內地欲調遣之時，船隻逆流而上，不能即可抵達。再，若動用我處之軍，不必駐扎盛京，願往京城調用。盛京之兵調往京城，我等軍調往盛京，雙方出兵之時，兵馬所需錢糧，又若家中支付錢糧，所需錢糧重複，故我等之兵，請徑直調遣至京城。倘若有當，我等皆年輕有力，吾親自率兵前往奮鬥等語。自部咨稱，查得，寧古塔為要地，故將軍不得率兵前來等語，於康熙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奏，當月十四日奉旨：依議。欽此。為此咨行。羅剎有事，新設章京率領人民，退至寧古塔。為此知之。密奏。四月初八日。都統白布善、薩布素將此閱畢。喀齊喀抄寫。<sup>65</sup>

康熙皇帝大加讚賞寧古塔將軍巴海等分別遷移瓦爾喀部眾。<sup>66</sup> 當時，瓦爾喀內部不

<sup>65</sup> 《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以下略稱《寧古塔檔》）1-1《康熙十五年烏拉吉林來文檔》四月十五日正藍旗特烏勒（Teole）牛衆領催吳爾吉查（Urgica）送來文書。

<sup>66</sup> 《寧古塔檔》1-1《康熙十五年烏拉吉林來文檔》五月初七日沙蘭（šaran）驛站人王瞎子（Wang hiya dži）送來文書。

斷有人聚眾計謀叛逃，個別人員亦逃至索倫之地。其結果也往往被捕捉，送至京城處罰，並分別編入人員缺少的八旗牛衆披甲當差。<sup>67</sup>

康熙二十二年（1683）爲編纂《大清一統志》，都統拜布善（Baibušan）咨文署理將軍事務之奉天副都統，報告寧古塔地理情形。這是一次有組織地調查寧古塔各地地理歷史狀況的一次重要活動。首先將山河、古蹟、碑文、果實、禽獸、蟲豸、異類等情，逐一詳察，爲儘速上報起見，負責該地區的各官兵，不分晝夜組織人員，迅速召集各地牛衆耆老，問詢轄內人文以及地理情形，茲將其具體調查過程節譯如下：

不知朝鮮會寧城是否藏有文書，若有文書，今年到朝鮮貿易官員攜來之後，日後送還。寧古塔城東北角四里之地，原先有覺羅（Gioro）村落住地，村東界有一城。南三里之外，虎爾哈河（Hūrha bira）沿岸有一城。寧古塔城之外，界內（jase dolo）南有一城。此等城皆廢，只存壞跡，周圍有五十、六十度，無城門形，無人居住。此等地方皆稱覺羅。因何名之為覺羅，寧古塔因何稱之為寧古塔，始祖皇帝龍興之地如何稱呼。等因。逐一詳問耆老，皆答不知。自寧古塔城西北五十餘里之外，海蘭河（Hairan bira）之南，有舊寧古塔石城。己卯年，大章京吳霸海（Ubaha）巴圖魯督築，周圍一餘里，東西門二。城外界門四，周圍五餘里，城內無人居住，周圍屯耕居住。康熙五、六年，寧古塔遷至現駐之城。城以立松木高三度，建置木城，由將軍巴海督築，周圍二餘里。東南西門三，北無門，城中建有衙門，東庫一，西倉一，衙門門外，東設砲四，城內東南角，置藥（火藥）房。西北置有草場，城南界東北各二里，南北面各三里，門四。南面依呼爾哈河（Hürga bira）沿岸。城內副都統薩布素居之……。寧古塔之地居民甚少，地理情勢山多水少，寒冷……近海處有蒙古（Monggo）、尼堪文（Nikan hergen漢文）石碑，將其拓送前來。碑石在越過亨滾河（Henggun bira）之海口。亨滾河羅刹居之，無兵不可至。寧古塔習俗：男女老少，種田為生，街無吵鬧聲，少訴訟盜竊，遵紀守法，人皆好騎射，性格樸實，無風流事，形制於古無別。清明不日後，方才耕種……<sup>68</sup>

67 《寧古塔檔》1-1 《康熙十五年烏拉吉林來文檔》四月初一日雲騎尉級章京布散（Busan）送來文書。

68 《寧古塔檔》1-9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始行文烏拉等的抄檔》十一月初六日正紅旗多吉

原檔案滿文相當冗長，從節譯部分也可以看出，當時的調查為蒐集編纂《大清一統志》寧古塔部分，提出了第一手資料。其中，就包括了各種歷史地理方面的信息，其中越過亨滾河之海口見到的蒙古文、漢文石碑，疑為《敕修奴兒干永寧寺碑記》（永樂十一年（1413））碑文。康熙十五年（1676）的拓本送交一統志館的跡象表明，康熙時期曾拓過該碑文。這比1885年曹廷傑訪問此地拿走的拓本還要早兩個世紀。<sup>69</sup>

禮部發出編纂令後，具體事務由奉天將軍派人到寧古塔等地收集歷史地理資料。其初步收集方法是首先召集尋訪當地各牛彖耆老，問詢記錄具體的地理歷史及古蹟等情，在此基礎上將歷史地理資料記錄為文字資料，其內容包括古蹟遺址的構造、各衙門設置狀況、建築構造、周圍環境、村落位置、河流特徵以及城之間距離以及各族集團生活方式等。這也是目前所能看得到的首次調查寧古塔週邊地理狀況的滿文文書。

其調查順序依次為奉天府尹傳達給副都統，副都統再傳給協領，協領開始召集各地牛彖耆老，問詢調查地區的各種地理特徵，展開具體的前期調查工作。最初，由協領拜布善咨文呈報奉天將軍和副都統等後，發現有很多調查不清的地方，下月再次下達了繼續調查的命令。<sup>70</sup>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密咨寧古塔將軍及副都統等人，報告康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有姓格依克勒之勒童額（Letungge）報稱：我去年秋季八月，至費雅喀地方交易，費雅喀噶善達（Gašan da）噶克當阿（Gakdangga）相告，有羅刹（Loca）近六十人，自北海越山而來，來到亨滾河獵貂費雅喀阿達薩爾村（Adasal gašan），殺害蘇勒忒庫（Sulteku）等三人，活捉一男子。又乘夜在吳克吞村（Uktun gašan）殺害齊勒巴南之弟弟，塔克沁村（Takcin gašan）一人。亨滾原先的噶善之五人全部被活捉，強令歸附貢貂，放還四人，抓去一人。放還之四人，羅刹交付一文留下，羅刹帶來奇勒爾人通事告知，明年我們大軍順黑龍江而來，各軍溯流亨滾河，征討費雅喀。若我等羅刹軍前來，汝等迎

訥（Dokine）牛彖領催迪布吉幹（Dibkio）送文。

69 最新的研究參看 A. P. Артемьев, *Буддийские храмы XV в. в низовьях Амура.* 日譯文參見菊池俊研・中村和之監修, 垣内あと訳, 『ヌルガン永寧寺遺跡と碑文—15世紀の北東アジアとアイヌ民族』。

70 《寧古塔檔》1-9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始行文烏拉等的抄檔》十二月十五日由驛站人常書（Cang šu）經驛站遞送文書。

降，提示我等文書，如此知道汝等爲降民不與侵害。汝等將我等之言告知赫哲、費雅喀之人，務必貢納貂皮，語畢而去。羅刹放還二人前來告知。<sup>71</sup>

薩布素親自詢問二人，其回答亦和噶當阿相同。噶當阿又告稱：亨滾源流地區住人奇勒爾噶善達余希雅納（Yuhiyana），派布虎楚（Buhucu）前來告稱：羅刹前來盡捉子女而去，將此情形告知寧古塔副都統等語。爲此，薩布素預想康熙皇帝會問及地理情形，準備派遣牛衆章京南岱前往調查。<sup>72</sup>這也說明了當地居民同寧古塔副都統之間的密切關係。

黑龍江地區設立駐防，主要是爲了防範俄羅斯侵犯黑龍江流域，康熙二十二年二月開始，議奏具體駐防事宜。《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乙未載：

寧古塔將軍巴海奏羅刹侵我費牙喀地方。兵部覆，愛渾、呼馬爾兩處，現議設兵駐防，應令將軍巴海駐愛渾，副都統薩布蘇駐呼馬爾地方，仍遣人不時偵探。上曰：寧古塔地方距費牙喀三千餘里，如何遣人不時偵探？用兵之道，全在爲將者審勢，相機酌量權變，未可遙度。該部並未詳察情形，懸議將軍、副都統駐劄地方，殊欠明晰！著將此本發回再議具奏。<sup>73</sup>

兵部首次提出設兵駐防愛渾和呼馬爾等地，計劃安排將軍巴海駐劄愛渾，副都統薩布蘇駐劄呼馬爾，並不時遣人偵察俄羅斯情形。對兵部的這一議奏，康熙皇帝大爲不滿。原因是兵部並未詳察具體情形，就輕易提出了將軍駐劄方案。這也說明康熙皇帝的對該地區防衛謹慎周密的態度。<sup>74</sup>

與此同時，寧古塔副都統已經得知亨滾河源等地，有俄羅斯人侵犯當地居民，這些消息都是通過深受俄羅斯侵害的當地居民或者前往交易的商人口中探知具體情

71 《寧古塔檔》1-8《缺冊名》康熙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寄給牛衆章京南岱（Nandai）文書。

72 同上註。

73 《康熙起居注》第2冊，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頁961。

74 早期的中俄關係史研究，參看 Gaston Cahen, *Le livre de comptes de la caravane Russe à Pékin en 1727-1728*,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英文參看 Gaston Cahen,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譯文參看ガストン・カーエン著，《露支交涉史序說》。中文論著參看何漢文，《中俄外交史》；田鵬，《中俄邦交之研究》；韓儒林，〈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記〉；劉遠圖，《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米鎮波，《清代中俄恰克圖邊境貿易》；姜長斌，《中俄國界東段的演變》。日文研究論著參看野見山溫，《露清外交の研究》；阿南惟敬，《露清對立の源流》、《清初軍事史論考》；吉田金一，《近代露清關係史》、《ロシアと中国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ズスク条約の研究》、《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ズスク条約》。

況。同年五月，又接到更進一步詳細的俄羅斯情報，並得知俄羅斯大肆殺掠不納貂皮之民，特別是了解到居住在亨滾河源等地的居民的暴行之後，決意採取對策。

同年得知黑龍江以北地區的俄羅斯正在造船，積極準備順亨滾河而下，溯流前來松花江、吉林等地居住的計劃。故薩布素密咨寧古塔將軍等人，提出若不殲滅俄羅斯，保護歸附之赫哲、費雅喀、奇勒爾等人，恐日後越加傷害各地居民，請求儘速調遣烏拉等地兵將前往征討。<sup>75</sup>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都統寄給牛彖章京季道的文書中，已探明俄羅斯抵達亨滾河（Henggun bira）流域，並殺害居住在亨滾河之獵貂之費雅喀（Fiyaka）阿達薩爾村（Adasal gašan）之蘇爾圖庫（Sultuku）等人。<sup>76</sup>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左右，大清國方面積極努力探尋俄羅斯動靜，仔細詢問此次前來之俄羅斯是否就是從北海而來等情。<sup>77</sup>在探尋俄羅斯消息的過程中，其中涉及到了黑龍江以北地區的自然地理方面的內容。此時檔案中涉及到的北海基本上指的是鄂霍斯克海周邊海域。

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始，在東北各地大舉進行驛站建設，並開始繩量東北大地，設立自烏喇之愛渾一路驛站。<sup>78</sup>驛站的設置，改變了信息的傳遞速度，也為迅速探聽俄羅斯消息打下了基礎。

康熙二十三年，大清國即派兵遠征圖乎魯河周圍地域，殲滅俄羅斯等佔領據地，俘獲甚多。據《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一〈安珠瑚傳〉：

（康熙）二十三年，隨都統公彭春（Pungcon）往征羅剎（Loca），黑龍江將軍薩布素（Sabsu）委為前鋒章京，掠圖乎魯河（Tuhūlu bira）有功。<sup>79</sup>

遠征圖乎魯河的具體時間為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以下文書詳細記錄了當時的具體征戰情況（全文參看附錄〔史料1〕）。

75 《寧古塔檔》1-8《缺冊名》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寄給鑲白旗色蒙額（Semungge）牛彖領催甘岱（Gandai）文書。

76 《寧古塔檔》1-9《自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起行文烏拉等地抄檔》八月十五日。

77 《寧古塔檔》1-9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送給牛彖章京季道（Jidao）文書。

78 《康熙起居注》第2冊，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庚戌，頁1137-1138。遣往設立烏喇至愛渾一路驛站郎中保奇、能得、額爾賽等奏請諭旨。上諭曰：此乃創立驛站之始，關擊緊要，爾等會同彼處將軍、副都統詢明熟識地方之人，詳加確議安設。凡住驛人役及馬匹牲畜需用之物，並所食糧米，今年耕種不及，須要算至明年，加意料理。倘遇過儉嗇，食用或至匱乏。必須從長計議，使其久遠可行，毋得狃于目前之見，草率了事。諭畢出。

79 《八旗通志初集》，卷151，〈安珠瑚傳〉（滿文，頁8b；漢文，頁3841）。

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臣薩布素等謹奏，為奏聞遣往亨滾之兵，降伏羅剎、奇勒爾事。營長楊古岱（Yanggūdai）、喀圖虎（Kathū）等派章京咨呈，五月十七日抵達亨滾河口，十八日溯亨滾河時，奇勒爾（Kiler）之額木楚（Emcu）、蒙努（Mengnu）等告稱：我等妻子為羅剎掠去，也許能逃出一兩人，我等親自在此守候。先前羅剎居住在亨滾（Henggun）、都齊（Duki）兩河之洲。今春冰融時，乘坐獨木舟，沿亨滾順流而下，溯伊米勒（Imile）河而上，自源流越過山嶺，往流向東北海方向的圖乎魯河（Tuhuru bira）方向行走等語。六月初三日，抵達伊米勒河口，參領等一同商議，停止逆溯亨滾，溯流伊米勒河行走六日，看得水流湍急，河床狹窄，船隻不能運行。故詢問奇勒爾之赫濟訥（Hejine）等，告稱：自此至河源，皆依舊如此，船隻不可運行。故交付正黃旗委署參領滿舍吉（Manšegi）、鑲黃旗委署參領瓦喀納（Wakana）、鑲紅旗委署參領牛墨順（Niomošon）等官兵，一併乘坐我等獨木舟、奇勒爾之樺皮船，溯流至河源察看。圖乎魯河之方向，探尋循陸路越過行走之地。有越過山嶺之處，行抵圖乎魯河，查明有無羅剎，前來報告。當月初九日派遣。十日夜半，滿舍吉等派人前來告稱：羅剎在山嶺附近之伊米勒河駐守，地勢密林叢生，是否築城居住，未能看清等語。我等親率章京兵丁，攜帶神威將軍（炮）四，十三日抵達滿舍吉駐劄之地。翌日，前往包圍羅剎居住之卡倫進行捕捉，交付鑲紅旗委署參領牛墨順，正藍旗委署參領博墨多（Bomodo）等，正紅旗委署閑散章京喀楚（Kacu），鑲白旗委署閑散章京馬齊（Maci），正黃旗委署驍騎校吉墨格里（Gimgeri），正白旗委署驍騎校圖木珠（Tumju）兵丁六十人，編隊遣往圖乎魯河方向埋伏於逾越之地。若羅剎敗走經過時盡殺之。如若人數眾多，分路突擊追殺等語。議定交付委署參領滿舍吉、鑲黃旗委署驍騎校哈喀喇、鑲紅旗委署領催博赫訥兵丁三十人、帶領七品官斡福納西（Ofunasi）等人，率先越過羅剎卡倫，紮營河邊，勸降羅剎。若羅剎不降，殺之等語……又，首次降伏原先未降之奇勒爾三十一戶之九十九丁。羅剎見大軍不動干戈就地降伏。深處山林，生如野獸之奇勒爾，聞知主上教化，眾人傾心向化，此皆賴皇帝隆恩鴻福。羅剎抵達之後，送至輕車都尉瑪喇處候旨。為此謹奏聞。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臣薩布素、副都統昇一品大臣溫

岱、副都統臣雅奏納。<sup>80</sup>

此次遠征營長楊古岱、喀忒虎等攜帶兵丁共六百一十八人。<sup>81</sup>自亨滾河等地帶來降伏俄羅斯四十七人，同年九月二十八日抵達鎮守黑龍江等地副都統處，準備分批送俄羅斯至京城。<sup>82</sup>

說到黑龍江流域的歷史，不能不提及首任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素的身世，日本學者增井寬也早就利用《陳學士文集》（乾隆十八年）卷十〈薩布素傳〉，指出薩布素（富察氏）始祖為充舜，居住在瓦爾喀部約克通鄂城，該城位於圖門江支流噶哈里河下游，為該部世襲大人（amban），曾祖哈木都及祖父哈爾蘇時，投靠努爾哈齊。<sup>83</sup>可以說自祖上開始，世代為約克通鄂城城主，<sup>84</sup>也是一位當地世族的後裔。有關傳記在後來的編纂資料中，基本都略而不詳。我在閱讀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的過程中，讀到有關薩布素的滿文傳記資料，具體冊檔名稱為《雍正十一年行文檔》。該檔詳細記載了薩布素的生平事蹟，對我們理解黑龍江、吉林的歷史沿革以及人文地理方面大有助益。因原文特別冗長，現節譯如下（全文參看附錄〔史料2〕）：

寧古塔副都統咨文將軍衙門，為查送事。……薩布素，寧古塔人，十八歲時，任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沙爾瑚達（Šarhūda）衙門筆帖式（Bithesi），在任筆帖式八年期間，寧古塔各地大小事務，章京等委任以及應派事務，盡心效力，大受讚賞。順治十八年（1661），升任驍騎校……。住西里木迪之俄羅斯，聞知大軍進兵黑龍江，駐扎在額蘇里，紛紛避走其國之烏第城（Udi hoton）。薩布素聞知欲遣兵往追，但路途遙遠，又無馬匹，令居住西里木迪之鄂倫春族長（Mukūn i da）吉爾

80 《黑龍江檔》1-1《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起行文抄檔》八月十八日鑲紅旗閒散章京牛墨順（Niomošon）帶走文書。該文書率先由楠木賢道譯成日文介紹，參看楠木賢道 1996 [史料 6]。

81 《黑龍江檔》1-1《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起行文抄檔》八月二十五日驍騎校康蘇（Kangsu）持走文書。

82 《黑龍江檔》1-1《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起行文抄檔》九月十九日正藍旗領催艾素持走文書。

83 參看增井寬也〈明末のワルカ部女直とその集團構造について〉，頁 88-89 和〈建州統一期のヌルハチ政權とボオイ=ニヤルマ〉，頁 6-7。

84 《清史稿》，卷 280，〈薩布素傳〉。薩布素，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四世祖充順巴本，以勇力聞，世為岳克通鄂城長。太祖時，其後人哈木都率所部來歸，屯吉林，遂家焉。薩布素自領催授驍騎校，遷協領。康熙十六年（1677），聖祖遣內大臣覺羅武默訥等贍禮長白山，至吉林，欲得識路者導引。寧古塔將軍巴海令薩布素率兵二百，攜三月糧以從。水陸行，至長白山麓，成禮而還，事具武默訥傳。除此之外，《碑傳記》中也有比較詳細的資料。

木阿（Girmungga）、里克丁阿（Likdingga）等派人往俄羅斯行走之狹路處埋伏，俄羅斯行走之時，吉爾木阿、里克丁阿突然伏擊全部射死。為此奏聞，大賞吉爾木阿、里克丁阿等人。同年將副都統薩布素任命鎮守黑龍江將軍。康熙二十三年，派章京往居住於精奇里江（Jingkiri ula）之俄羅斯處，深入其地，盡悉降伏，俘獲者送至京城。又派章京率兵往居住亨滾（Henggun）之俄羅斯處，兵馬未到之前，眾皆逃竄至彼國烏第城（Udi hoton）。

派章京率兵赴東海沿岸之居住圖乎魯河（Tuguru bira>Tuhuru bira）俄羅斯，亦深入其地盡悉降伏，捕送京城。原先未降伏之奇勒爾（Kiler）百餘戶男丁，亦初次歸降，約定貢貂。康熙二十四年攻取俄羅斯雅克薩城時，盡拿活捉俄羅斯兩隊哨兵，就地分水陸兩地立營分攻，五月二十四日夜遣派火器營，二十五日乘夜將軍薩布素親率一隊兵馬，緊逼城西北角，放火箭急攻，及至巳時，降伏俄羅斯頭目額里克謝耶（Elikše）等官兵六百餘人。遵照諭旨，放回願歸彼國之人，自願降伏之人，暫歸頭目伊凡（Ifan）管理，續而降伏之頭目巴實里（Bašili）等四十餘人，送至京城……<sup>85</sup>

此文書雖說是雍正年間為編纂《大清一統志》而收集的文書的一部分內容，其中記載的內容多為其他漢籍資料所不記。不僅對黑龍江第一任將軍薩布素的生平事蹟多有專述，也詳細記載了黑龍江以北地區諸種部族的主要活動。對深入了解黑龍江以北地區的歷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康熙年間，俄羅斯繼續出沒於黑龍江南北各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為了防範俄羅斯設置了 Sahaliyan ula i jergi babe tuwakiyara jiyanggiyūn（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由薩布素首任將軍，成為名副其實的鎮守黑龍江地區的軍事基地。與此同時，俄羅斯同大清國之間出現了多次衝突，雙方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原先由寧古塔將軍轄理的俄羅斯事務，經黑龍江將軍設置之後，開始由黑龍江將軍負責管理黑龍江地區的俄羅斯事務，並協同兵部和理藩院處理具體案件。

黑龍江將軍的設置，其主要原因除抵禦俄羅斯的南下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不可忽視。那就是這一時期大清國想介入準噶爾和喀爾喀之間的紛爭，充當調停

85 《寧古塔檔》2-9《雍正十一年行文檔》八月十九日驛站丁陳子貴（Cen dici gui）經驛站送來之文。

者。後來，因嚴寒以及運糧不及，農田耕種季節有限等緣由，黑龍江將軍從當初駐劄的黑龍江北岸的愛渾城，遷至江南的黑龍江城。康熙二十八年（1689），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後，康熙二十九年，黑龍江將軍移駐墨爾根。其理由明記為「俄羅斯國（Oros gurun）服主上德化，決定指定地方作為永遠之疆界，將駐兵撤之墨爾根之地，築室耕作」。<sup>86</sup>這說明了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後，大清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得到緩解，為雙方邊界地區帶來了和平和安定。

康熙三十八年（1699），大清國和噶爾丹之戰結束後，將軍衙門從墨爾根移駐位齊齊哈爾城。齊齊哈爾為蒙古、錫伯、索倫、達斡爾等部居住之戰略要地，是途徑興安北部、呼倫等地的必經之路，也是直達尼布楚的重要捷徑。所以，將軍移駐齊齊哈爾考慮了應付興安以北出現緊急情況時，迅速調兵遣將，隨時可以前往應付的軍事目的。

另外，齊齊哈爾周圍地區有廣大的牧場及農地，亦是馴養軍馬和屯墾的好地方，作為軍事基地具備了得天獨厚的條件。<sup>87</sup>黑龍江將軍衙門的移駐，其實是考慮了歐亞全體的政治格局和遊牧民的動向而採取的措施。總而言之，黑龍江將軍的移駐，不僅針對俄羅斯，也為應付勢力日漸強大的準噶爾勢力以及應內外蒙古情勢的變化而採取的行動。

尼布楚條約簽訂後，黑龍江將軍衙門開始從愛渾移駐到墨爾根城，開始討論移駐計劃，於此同時，也開始議論如何視察黑龍江流域邊境地區的問題。這樣就展開了國境視察計劃，這些計劃由地方將軍向朝廷提交了很詳細的報告，其中理所當然也包括了沿著一定的路線視察國境地帶的路線問題，隨行人員中也就出現了畫匠一詞，從中也可以知道繪製輿圖也是當時的一個任務。

視察一語為滿文 tuwaname genembi（直譯為「去看」之意）的譯文，在語意上不同於 baicame genembi（調查），且康熙二十九年檔案基本都以 tuwaname genembi（視察）記載為主，故本文使用「視察」一詞，以別於後來的 giyarime genembi（巡察）以及 baicame genembi（調查）等用語。

86 《黑龍江檔》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門、盛京刑部來文抄檔》正月初四日由筆帖式定珠遞來文書。

87 《黑龍江檔》2-6《康熙三十年正月吏部、刑部、督捕衙門、盛京兵、刑部行文抄檔》正月十七日奏文及《寧古塔檔》2-9《雍正十二年行文檔》八月九日驛丁陳子貴經由驛站遞送文書。

在《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康熙朝、滿文）中，對視察黑龍江流域國境地帶的經過、報告書的提交以及輿圖製作等過程有詳細的記載。這些資料為我們研究這個時代的輿圖史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例證。以下就利用這些滿文檔案史料，考察其具體的視察經過。

有關九路視察問題，1997年，由松浦茂首次進行過研究。在此參照松浦茂的研究，並利用滿文《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和《寧古塔副都統檔案》的相關史料為基礎，考察這次黑龍江流域視察活動的具體實施情況。進而探討當時繪製輿圖的問題。

### 三、康熙二十九年九路視察隊伍

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黑龍江地區迎來了安定和平。同年十二月，理藩院員外郎達賴（Dalai）給康熙皇帝的一份奏摺中，引用了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給議政大臣咨文的內容。其中，提及了準備在黑龍江北部地區進行多條路線視察的問題，並言及視察邊界的重要性問題。這表明了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大清國制定了對界定的邊界進行全面視察的計劃。此次派出九路視察隊的理由，松浦茂如此寫道：

北岸地區成為空白的可能性較大。為確認國境進行調查，對清朝來說成為優先的緊急課題。<sup>88</sup>

明確提出調查計劃開始的時間為康熙二十八年末。松浦茂依據的是《黑龍江檔》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初四日的檔案，其中引用了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的奏文。原文書無年月日，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初四日，是筆帖式定珠（Dingju）遞送文書的時間，其中包括其他文書多件。其內容如下：

兵部咨行黑龍江將軍等。爾等（黑龍江將軍等）咨稱：預備明年移駐將兵及家屬至黑龍江（Sahaliyan ula）和墨爾根（Mergen）。若明年至額爾古納（Ergune）及格爾必齊（Gerbici）之地立碑，到北興安（Amargi hinggan）視察（tuwanabure jergi baita）不生草的山梁之地等事，我等無暇派遣將兵移駐戶口，為此知照兵部。等因。（兵部）查得：駐劄黑龍江、墨爾根將兵戶口，來年秋季盡悉移內。且現議政大臣議奏，調

---

88 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數民族》，頁6。

查熟知自額爾古納河口上溯到墨里勒肯（Merilken），沿黑龍江對岸之格爾必齊河上溯到不長草的興安山梁，直到海邊之地之輩，應從幾路（udu jurgan）前往視察之處，令索倫總管瑪布岱（Mabudai）、寧古塔將軍佟寶（Tungboo）等奏聞。等因。從幾路前往視察，兵士隨從如何等事，尚未議定。故將該將軍等來文告知，兵將毫無閒暇一事，免議。將此回覆知會，為此咨行。此書無年月日。<sup>89</sup>

黑龍江將軍對立碑事宜，回覆稱還沒有充足的時間前往視察。為此兵部回覆了處理意見。即遷移位於黑龍江北岸的愛渾將軍駐屯地到南岸的黑龍江城。並在墨爾根城留守一部分將兵。討論移駐的同時，也提出了視察黑龍江以北地區的計劃。該計劃經康熙皇帝的裁可。

正如上述檔案所見，康熙二十八年已開始計劃視察路線，並積極找尋熟知地理狀況的人員。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的奏文中，詳細論及該視察計劃的路線和具體參加人員。理藩院員外郎達賴（Dalai）於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奏文如下：

理藩院員外郎臣達賴謹奏，為遵旨查奏事。議政王會議題奏，將軍薩布素等奏稱，查得，臣我等軍中有人知道額爾古納河（Ergune bira）之墨里勒肯（Merilken）之地，陸地行走之處。由此可派一路前往視察。自額爾古納河口（Ergune angga）上溯抵墨里勒肯之地，黑龍江北岸格爾必齊河（Gerbici bira）上溯至不生草之地，沿興安山梁（Hinggan i mulu）直至海邊，無人知道。故自額爾古納河口上溯到墨里勒肯為止，自北興安（Amargi hinggan）流出，匯流到黑龍江（Sahaliyan ula）的精奇里河（Jingkiri ula）、西里穆迪（Silimdi）、牛滿（Nioman）等地源流附近，索倫總管瑪布岱（Mabudai）等管轄鄂倫春（Oroncon）、索倫（Solon）漁獵為生，查找熟悉人員，令瑪布岱等題奏應通過幾路（Udu jurgan）前往視察等事。

黑龍江（Sahaliyan）、松花江（Sunggari ula）匯流處至海，自北興安匯流至松花江的奇穆尼河（Kimnin）、呼魯（Huru）、格林（Gerin）、亨滾（Henggun）等河源周邊地區（sekiyereme），皆有寧古塔將軍佟

<sup>89</sup> 《黑龍江檔》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門、盛京刑部來文抄檔》正月初四日由筆帖式定珠遞來文書。該文書最後寫有 ere bithe de, aniya biya inenggi akū(該文無年月日)。

寶（Tungboo）等統轄之奇勒爾（Kiler），佟寶等查找熟悉人員，令佟寶題奏應通過幾路（Udu jurgan）前往視察事。

查得，視察立界之地（hešen ilibure ba）為要務。今總管瑪布岱（Mabudai）、將軍佟寶等查找熟知地形之人具奏。如無熟知人員，往返費時，今即於此地派送官員二人，一人到將軍薩布素、總管瑪布岱處。一人到將軍佟寶處。會集熟知地理人員詳細查考，通過幾路前往視察，或應編隊前往視察等事宜，詳細議論題奏之後，令該部為應派遣人員，題奏請旨。現應派人員，自該部引見題奏派遣。等因。於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題奏，當月十三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

會同大臣查找熟知黑龍江、北興安等地人員。從墨爾根到額爾古納之墨里勒肯為止，由正藍旗達斡爾鄂魯波沁牛衆（Elpecen niru）驍騎校席納達依（Sinadai）、正紅旗達斡爾畢爾充額（Bilcungge）牛衆披甲阿西烏爾（Asiul）熟知陸路。行走需二十多日。為此可於秋八月，可為一路前往視察。

熟知額爾古納河口到墨里勒肯路之索倫特布忒牛衆（Teputei niru）的鄂爾呼特（Erhute）言稱：額爾古納河口到墨里勒肯為止，乘獨木舟（weihu），水路上溯需行走近二十日，此可為一路，自水路前往視察。

熟知精奇里河源方向之鄂倫春額勒必沁（Erebkin）、綽坡尼（Coponi）等言稱：自墨爾根到精奇里河源，秋八月左右騎馬行走需月餘。自此至興安山梁，一日即可抵達，有馬可食牧場，自此為一路，可騎馬前往視察。

熟知精奇里河源方向之鄂倫春蘇蒙庫（Sumungku）、勒爾格兒（Lerger）、哲京（Jegin）等言稱：自黑龍江城至西里穆迪源流之英肯河口（Yengken birai angga）為止，秋八月騎馬需一月左右。英肯河口之外，皆石多無牧草，不可騎馬行走。若步行走四、五日可抵興安山梁。此可為一路前往視察。

格爾必齊河口（Gerbici birai angga）到源流為止，去年在此地降伏之索倫奇幹喇（Kiora），佟古尼（Tungguni）言稱：可騎馬行走。自格爾必齊河口至源流，需十日左右，無馬匹可食之牧草。自此之外，皆布滿山崖亂石。

熟知牛滿河源方向的索倫額爾德依牛彖（Ekidei niru）之瑪蘭丘（Marancu）言稱：自黑龍江城乘獨木舟，抵牛滿河源之渥倫奇河口（Olongki birai angga），需行走一月有餘。自此之外，皆為山崖亂石，步行騎馬均不可通行。為此謹奏。理藩院員外郎臣達賴（Dalai）、鎮守黑龍江將軍臣薩布素（Sabsu）、索倫總管瑪布岱（Mabudai）、總管臣貝勒里（Beiler）。<sup>90</sup>

理藩院員外郎達賴和黑龍江將軍、索倫總管瑪布岱、總管貝勒里會議之後具奏文書。顯然這件文書最初由黑龍江將軍咨行中央，由議政大臣議覆，奏報皇帝，經皇帝裁可，傳諭兵部，再由兵部咨行傳令給黑龍江將軍。同時，理藩院亦派員外郎達賴同黑龍江將軍、索倫總管等協助會議上奏。

其最終結果就如何進行視察，派經幾路人馬前往等事宜，委任索倫總管瑪布岱和寧古塔將軍佟寶討論決定。為了節省時間，由理藩院派主事薩魯圖到寧古塔將軍處，另外派員外郎達賴直接同黑龍江將軍協力進行選拔視察人員的調查工作。如此就報告通過如下九路前往視察的計劃。<sup>91</sup>

首先，由寧古塔將軍和主事薩魯圖題奏以下路線。視察興安的路線，因無人知道陸路，決定由水路派往。經調查得知格林、亨滾等河流皆源出興安，可以在冰雪融化之後，派船隻和獨木舟赴（1）格林、（2）亨滾、（3）沿著海岸等三路前往視察。即提出了三路經水路前往調查的計劃。<sup>92</sup>

其次，陸路可以由（4）墨爾根城到額爾古納河的墨里勒肯，秋八月，一路前往視察。（5）墨爾根到精奇里河源流為止，秋八月，騎馬前往視察。（6）從黑龍江城到西里穆迪河源的英肯河口為止，秋八月左右，騎馬需一個月。英肯河之外，需四、五日可徒步行抵興安山梁。（7）格爾必齊河口到源流為止，秋八月左右，騎馬可用十日左右抵達。此外皆為山崖岩石，徒步以及騎馬皆不能穿行。除此之外，通過水路（8）從額爾古納河口到墨里勒肯為止，可由水路視察。（9）從黑龍江乘獨木舟，到牛滿河源的渥倫吉河口，需一個月左右。此外都是山崖岩石，徒步

90 《黑龍江檔》2-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戶、禮、工部、理藩院、盛京戶、工部等衙門行文抄檔》正月二十八日咨行理藩院達賴（Dalai）之文書。

91 松浦茂（1997）首次利用《黑龍江檔》介紹了九路人員構成和視察經過。

92 《黑龍江檔》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門、盛京刑部來文抄檔》三月初五日由正黃旗領催松圖（Sungtu）遞來文書。

騎馬都不能通行。<sup>93</sup>以上就是水陸總共兵分九路進行視察的具體路線。

提出九路視察的路線之後，黑龍江將軍和寧古塔將軍調查選拔熟知該地地理情況的當地人員，並提出可兵分九路前往視察。為此奏請皇帝任命派遣相關各路線參加人員。於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十四日議政王上奏，當月十七日傳旨「依議，應派人員列名上奏」，最後得到皇帝的同意。<sup>94</sup>

#### 四、視察隊伍編隊情況

據兵部咨行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的文書來看，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上奏九路視察隊伍成員名單，同月二十二日決定了參加人員。即寧古塔三路由巴海、巴魯塔、蘇赫三人，墨爾根三路由郎談、沙納海、趙三、安珠瑚四人，黑龍江三路由穆圖、諾敏、華善、納秦四人，各自統領視察隊。<sup>95</sup>據同年三月十四日，鑲黃旗奇勒德牛衆領催吳岱送來的兵部咨行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的文書記載，參加視察隊伍的所有成員全部由康熙皇帝親自選拔。

同時，各隊均配備畫匠一名，顯然這是專為繪製輿圖派去的人員。另外，俄羅斯人（羅刹人，Locai niyalma）即先前降伏編入牛衆的俄羅斯人各隊配備一名，作為熟知黑龍江以北地理情形的嚮導（Gajarci）加入視察隊伍。

這樣就拉開了國境地區實地調查的序幕。首先，寧古塔將軍巴海率領的視察隊伍，於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中旬出發，所有裝備皆自辦，抵達黑龍江城和墨爾根後，調配換乘當地馬匹前往目的地。另一方面，上奏陳請理藩院派人參加，該要求也迅速得到康熙皇帝的許可。<sup>96</sup>

此後，寧古塔將軍巴海同兵部商議，決定水陸並進。各視察隊由章京三人，兵五十人，水路由水手五十人組成。寧古塔三路，由烏喇和寧古塔地方官兵、水手承擔任務。墨爾根方面三路由索倫、達斡爾官兵組成。

93 同上。該文書於三月十四日由鑲黃旗奇勒德牛衆（Kilede niru）領催吳岱（Udai）遞來文書。原文書日期為 ilan biyai ice（三月初一日）。

94 《黑龍江檔》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門、盛京刑部來文抄檔》三月十四日由鑲黃旗領催奇勒德牛衆領催吳岱遞送文書。

95 同上，三月二十六日由鑲白旗領催康吉納（Kanggina）遞送文書。有關視察隊成員，可參看松浦茂（1997）。

96 《黑龍江檔》1-10《康熙二十九年吏、兵、刑部、督捕衙門、盛京刑部來文抄檔》三月十四日由鑲黃旗領催奇勒德牛衆領催吳岱遞送文書。

在視察活動開始之前，首先進行了解地理狀況，開始了周到的事前準備。通過俄羅斯牛衆的人員，問詢九路地理狀況。查明寧古塔和吉林方面的兩個路線及墨爾根三路、黑龍江城至牛滿河水源的渥羅奇河口為止的路線，沒有人知道詳情。

其後，水路方面也進行了查訪，其中康熙二十九年三月的一份報告內領催席圖班（Situban）等言稱：

亨滾河河口乘獨木船溯流而行二十日，抵達伊米勒河。自伊米勒河溯流而行五日，陸路續行四日，抵達圖赫里河（Tuheri bira, 即 Tuhuru bira）。自圖赫里河通過陸路行走二十五日抵達烏第河。此二十五日期間，不長草木，盡布苔蘚。亨滾、烏第之處，住有奇勒爾、鄂倫春等人。圖赫里河和烏第河之間，不長草，有攀山越嶺可行之處。不知何地稱為興安。<sup>97</sup>

另外，從雅克薩到西里木迪河之間的路線，據披甲拉薩里（Lasari）前來報告如下：

自雅克薩乘船月餘，曾抵達西里木迪河。其他情況不清。<sup>98</sup>

與此不同的另外一個路線，查明有人去過格爾必齊河口到水源之地。據領催幹里塔西（Oltasi）報告如下：

格爾必齊河口到水源為止，步行需十一日即可抵達。自此之外，因遇冬雪季節，山崖亂石處，腳踏滑雪板（Suntaha），七日抵達兔乎魯河（Tuheri bira>Tuhuru bira）。不知稱為興安之地。<sup>99</sup>

這些報告都表明了，出發之前積極準備詳察行走路線及所需日程等具體問題。

經過以上九路視察，留下了大量的視察報告。其中也包括很多輿圖資料。一般所謂的「九路圖」或「九大人圖」等名稱的輿圖，實際上都和康熙二十九年視察邊界活動有關。也有個別輿圖是按照當時的檔案資料和輿圖資料，在康熙末年重新繪製而成。流傳至今的康熙年間繪製的有關黑龍江周邊流域的輿圖，明顯都受這些輿圖影響，或者摹繪這些輿圖重新貼寫後來反復調查後得知的新的河川地名。所以，此次九路視察活動意義非常深遠。

九路視察繪製的輿圖，其實和本文所要探討的《烏喇等處地方圖》有直接的關係。這裡僅就《烏喇等處地方圖》談談其具體流傳過程。

<sup>97</sup> 同上。

<sup>98</sup> 同上。

<sup>99</sup> 同上。

## 五、《原任都統巴海帶來圖》的出現

1997年，松浦茂首次利用滿文檔案研究九路視察的歷史，他在文中指出「巴海繪製的地圖至今不知所在」。<sup>100</sup> 究竟如何？我們現在看一下康熙二十九年寧古塔將軍巴海視察之後提交的跟輿圖有關的問題。直接跟巴海視察有關的這幅輿圖，目前，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現以《烏喇等處地方圖》（所藏號碼平圖021453，134cm×111cm）題名登記收藏。

《烏喇等處地方圖》描繪的是，黑龍江下游北部的亨滾河和流入鄂霍次克海（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的兔乎魯河（Tuhuru bira）流域，也是今天能夠看到的有關該地區的一幅詳細的區域圖。此圖標有滿文四至東西南北（滿文dergi（東）脫落），共繪有21條河流，二處山（烏葉肯山（Uyeken alin）和廟灣山（Miyoo wan alin）），八處山峰繪有白雪狀。全圖用滿文註記，無年代和繪製人名稱等（詳見〈烏喇等處地方圖地名對照表〉）。其繪製方法與相關的滿文輿圖相比，繪法獨特，耐人尋味。此圖在不同角度觀覽，圖形及樹木山脈皆成正面，為其他輿圖所不見（圖4）。

巴海等人在康熙二十九年視察之後，如何繪製輿圖，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還不能找到其具體的題奏文書，亦未能查到繪製輿圖的具體情形等相關報告。當時，視察之後繪製的輿圖，到了康熙四十九年左右，集中出現在滿文檔案中。出現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內閣一統志館為編纂各地地誌，傳令各地將軍協助調查。也就是說在調查黑龍江以及寧古塔等處地理人文狀況時，自內閣一統志館及兵部寄來的文書中，出現用既往繪製的輿圖重新訂正並繪製輿圖的資料。這樣就出現了《巴海繪製後帶來圖》、《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帶來圖》同圖異名的不同記載。

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齊蘭寶（Cilamboo）咨文中，抄有自內閣一統志編纂館咨行兵部司武廳的一份文書。其中，主要涉及到調查黑龍江地區山川、河流等情形，對考察黑龍江流域山川河流等地理問題非常重要，節譯如下（全譯文參看附錄〔史料3〕）：

內閣一統志書編纂館咨行兵部司武廳，為前往視察事。黑龍江將軍咨稱：齊齊哈爾東方至海五千五百里處與海相接。看圖（Nirugan）內齊齊哈爾東方並無與海相接。東方疆界是否與海相連，詳查送來。東南角

100 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數民族》，頁26。

至黑龍江、松花江交匯處兩千三百里，與寧古塔將軍轄境相接。看圖內黑龍江、松花江交匯處，位於齊齊哈爾城東北。兩江交匯處，是否可以齊齊哈爾城之東南為界，查清送來。東北角至入海之兔乎魯河，有五千五百里，同俄羅斯接境。送來之檔冊中，稱免乎魯河周圍山河等諸項為寧古塔轄區，何故又以齊齊哈爾東北為界。以齊齊哈爾東北角等地為界，是否正確，查清送來。又，看送來的圖內寧古塔、吉林烏喇、俄羅斯、蒙古等地山河等合併繪圖送來。將此咨行黑龍江將軍，命黑龍江將軍繪來轄內之地，其他不必繪製……。

又，看《大圖（Ambar nirugan）》、《巴海繪製後帶來圖（Bahai nirufi gajiha nirugan）》內齊齊哈爾城東北，亨滾河西有圖吉河（Tugi bira），此河自西東流，匯入亨滾河。亨滾河東源稱之為赫門河（Hemen bira），此河自西北流向東南，成為亨滾河。亨滾河之北有格爾必河（Gerbi bira），此河自西南流向東北，匯入伊米勒河（Imile bira）。伊米勒河之東北有額墨爾河（Emel bira），此河自東北流向西南，匯入伊米勒河。伊米勒河之東北有西穆爾河（Si mur bira），此河自東北流向西南，匯入伊米勒河。亨滾河之南方有衣母河（Imu bira），此河自西南流向東北，匯入亨滾河。亨滾河之北有魯庫河（Luku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匯入亨滾河。亨滾河之北有薩穆尼河（Samnun bira），此河自北南流，匯入亨滾河。威爾吉河（Wergi bira>Weigi bira）和阿薩里河（Asarni bira）之間有鈕瓦克塔河（Niowakta bira），此河自西北流向東南，匯入兔乎魯河。塔林河（Talin bira）和磨尼可河（Munike bira）之間有廟灣山（Miyoo wan alin），穆尼克河之北有也米勒恩河（Miyemilen bira），此河自北南流，匯入穆尼克河。穆尼克河之東，有厄兒何懸河（Elgeken bira），此河自北南流，匯入兔乎魯河。以上山河若為黑龍江所屬，繪入黑龍江圖和檔冊之中，並查明送來在城之何方幾里之外，源流出自何處，匯入什麼河流。再，將《黑龍江將軍繪製送來圖》，《原任都統巴海繪製送來圖》亦一併送來等語。我等大臣等告知，依議。等因。為此告知汝等大臣，迅速送至黑龍江將軍處，詳細查明繪寫記檔送來。為此咨行。圖兩幅，七月三十日。收掌官（Bargiyara asarara hafan）<sup>101</sup> 納

101 收掌官：位次提調官，收貯出版書籍、以及文書、冊籍等官。

秦（Nacin）、劉寶柱（Liobooju）、敦柱（Donju）。將軍宗室楊福、副都統宗室勒色里（Leseri）閱畢上述三項，交付委事協領德奇（Deki），烏爾都（Uldu），防禦安奇（Anci），驍騎校古勒特依（Guretei）等。筆帖式王石達（Wang ſi da）記。<sup>102</sup>

利用檔冊和輿圖進行查考黑龍江地理形勢，發現不少檔冊和輿圖記載多有不同，也有很多山川河流名稱沒有記入檔冊和輿圖之中，令黑龍江將軍盡速查明重寫繪製輿圖記入檔冊內。該文書引用的《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描述的內容和現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烏喇等處地方圖》內容上完全符合一致。上引資料的劃線文字部分，無論河流走向還是山脈名稱，同《烏喇等處地方圖》的內容完全一致。故可以說今天的《烏喇等處地方圖》，即為康熙四十九年滿文檔案中出現的《原任都統巴海繪製送來圖》。另外，檔案中提及的《黑龍江將軍繪製送來圖》，其實目前也收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題名為《黑龍江流域圖》。

除此之外，還有一份能夠直接證明《烏喇等處地方圖》就是《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帶來圖》的文書。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驍騎校珠爾克（Jurke）遞送的文書，節譯如下：

又，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帶來圖（gūsai ejen bihe bahai nirufi gajiha nirugan）》，亨滾河之北，有格爾必河。此河西南流向東北匯入伊米勒河。伊米勒河之東北有阿瑪河。此河東北流向西南匯入伊米勒河。伊米勒河東北有西穆爾河。此河東北流向西南匯入伊米勒河。亨滾河之南有伊穆河。此河西南流向東北匯入亨滾河。亨滾河之北有魯庫河。此河自北流向南匯入亨滾河。亨滾河之北有薩穆尼河。此河自北南流，匯入亨滾河。威吉河、阿薩里河之間，有鈕瓦克塔河。此河自西北流向東南，匯入兔乎魯河。阿薩里河和穆尼克河之間，有塔林河。此河自西北流向東南，匯入兔乎魯河。塔林河和穆尼克河之間，有廟灣山。穆尼克河之北，有乜米勒恩河。此河自北南流匯入穆尼克河。穆尼克河之東，有額爾格肯河。此河自北南流匯入兔乎魯河。查清送來此等山河位於寧古塔何方，在幾里之先。若為河流自何處流出，匯入何方河流等。以上山

102 《黑龍江檔》16-21《自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理藩院、盛京兵部行文抄檔》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由齊蘭穆寶（Cilamboo）遞送文書。滿文地名相應漢字採用《皇輿全覽圖》（漢文木板）內對應漢字。該文書部分日譯文參看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頁23-24。

峰、河湖、島嶼、獵場、渡口、山梁之類，皆繪入輿圖繕寫檔案送來。又，先前送來檔案內，至東北費牙喀三千餘里，同海相連界。現自兔乎魯河之內之山河等類，皆稱為寧古塔轄區。東北接境以免乎魯河為界是否正確，查定送來。原先調查山河等類時，為參照便利之故，送來之《寧古塔圖》、《原任內大臣郎談繪製後帶來九路圖》、《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帶來圖》，預備匯集送還。告知大臣等照依行事。為此告知汝等大臣，寧古塔將軍儘速繕寫查清檔案，繪製輿圖送來。等因。<sup>103</sup>

康熙四十九年檔案中閱覽的《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帶來圖》，從記載的內容和河流走向的描述來看，其實就是本文論述的《烏喇等處地方圖》。這篇滿文抄檔原文相當冗長，詳細記載了調查各地地理狀況。證引內容的劃線部分，和前引檔案完全相同。不容置疑，當時閱覽的都是同一張輿圖。通過上引資料，也可以發見康熙四十九年左右，利用多幅滿文輿圖，重新調查並繪製寧古塔各地輿圖的情況。其中利用的一幅滿文輿圖，就是《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帶來圖》，即《烏喇等處地方圖》。

## 六、《烏喇等處地方圖》山川名稱

以下，按〈烏喇等處地方圖地名表記對照表〉順序，分別利用檔案資料和編纂資料考訂《烏喇等處地方圖》山川名稱等問題。具體引用資料名稱，按年代順序，茲列於下：

檔案資料：

- (1) 《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康熙四十九年（1710））
- (2) 《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檔案全宗名稱，以下簡稱《寧古塔檔》）。
- (3) 《雍正十二年行文檔》（《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
- (4) 《鄂多理城寧古塔城地域檔》，登錄號：16753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該檔冊為《大清一統志》鄂多理，寧古塔部分滿文

---

<sup>103</sup> 《黑龍江檔》16-25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黑龍江副都統、索倫總管、驛官行文抄檔》十月二十一日由驍騎校珠爾克遞送文書。

稿本。

#### 輿圖資料：

- (1) 《口外九大人圖》（平圖021577，169cm×233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2) 《吉林九河圖》（康熙五十年（1711）繪製，平圖021457，107.5cm×123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3) 漢文地名參照《皇輿全覽圖》（共三十五圖，漢文木板）（略稱：漢文《皇輿圖》），滿文地名參照《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共四十一圖，滿文銅版）（略稱：滿文《皇輿圖》）
- (4) Carte général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dressée sur l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faites sur les lieux par les RRPP Jesuites et sur les memoires particulières du P. Gerbillion par le Sr. d'Anville. 1732. (略稱：d'Anville (1732))<sup>104</sup>
- (5)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蹟輿圖》（乾隆四十三年（1778），略稱《戰蹟圖》）<sup>105</sup>

#### 編纂資料：

- (1) 《盛京通志》（三十二卷，伊把漢、董秉忠等輯，孫成等纂（康熙23年（1684）），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近衛文庫藏，略稱《盛京通志A》，《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三年版），略稱《盛京通志B》）
- (2) 《大清一統志》（乾隆九年，略稱《一統志A》）及《欽定大清一統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庫全書所收（略稱《一統志B》））
- (3) 《水道提綱》（齊召南編錄，共二十八卷，乾隆四十一年（1776））
- (4) 《吉林通志》（共一百二十二卷，光緒十七年（1891）序）

上述資料不見之漢字地名，由筆者擬定，一一註明。需要說明的是，表格中1、14、15、27為輿圖方位詞，不計考訂之內。

<sup>104</sup> 該圖原版由應地利明教授（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提供閱覽，謹致謝意。

<sup>105</sup> 該圖原版由筆者指導教授礪波護教授（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提供閱覽，特此致謝。

## 2 拖倫河 (Toron bira)

《口外九大人圖》作 Toron bira。

據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記載：看《原任內大臣郎談繪製帶來圖》內黑龍江邊界 (jecen) 附近，東北有奇勒非河 (Kilfi bira)、拖倫河 (Toron bira)。東南有畢瞻河 (Bijan bira)。<sup>106</sup>

按，《原任內大臣郎談等繪製後帶來圖》為康熙二十九年繪製，說明早在康熙二十九年就已查過該河位置。

## 3 奇勒非河 (Kilfi bira) 同上。

《口外九大人圖》作 Kilfi bira。

## 4 烏葉肯山 (Uyeken alin)

《口外九大人圖》作 Uyeken alin。

康熙四十九年檔案記載：看《原任內大臣郎談繪製後帶來圖》，黑龍江將軍轄區內，墨爾根城東方有喀穆尼峰 (Kamni hada)、蘇喇西峰 (Sulasi hada)。東北有揚山 (Yang alin)、岳溫山 (Iowen alin)、都色山 (Deose alin)、烏葉肯山 (Uyeken alin)、青吉德山 (Cinggide alin)、魯瑪喀爾峰 (Lumakar hada)、亨滾河 (Henggun bira)。<sup>107</sup> 該河也說明在康熙二十九年繪製的輿圖中繪有該河。

關於烏葉肯山，松浦茂推定為《柳邊紀略》卷一記載的「威伊克阿林」。<sup>108</sup> 否定了吉田金一和劉遠圖推定的地望。但是，本文探討的〈烏喇等處地方圖〉中不見繪有任何碑文形制，另外，松浦茂的這一推定也和當年派兵多路尋找石碑材料，並於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報送未能找到適於製作石碑的報告，互相矛盾。而《柳邊紀略》的巴海等人兵分三道前往視察的記錄，註有「時方六月」，顯然和七月沒有找到石材的報告，互有抵觸。當年記錄的滿文抄檔作為第一手資料，比《柳邊紀略》等後來的漢文資料更詳細可靠。且界碑出現在輿圖上的歷史，並非是康熙二十九年，而是康熙四十九年以後才開始出現在滿文檔案中，所以，〈烏喇等處

<sup>106</sup> 《黑龍江檔》16-21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部、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來文抄檔》正月初四日由卜魁驛丁齊蘭寶遞送文書。

<sup>107</sup> 《黑龍江檔》16-24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龍江副都統、墨爾根城協領、索倫總管、驛站官行文抄檔》一月初七日由領催阿爾圖哈 (Altuhu) 遷送文書。

<sup>108</sup> 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數民族》，頁 24-25。

地方圖〉的出現，也是當年沒有立碑的一個重要史實。<sup>109</sup> 多年來，爭論不休的界碑問題，通過該圖的出現，亦可更正前人的誤解。

### 5 乜米勒河（Miyemile bira）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Miyemile bira。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記載：匯入松花江之霍倫河（Holon bira）、巴蘭河（Baran bira）、薩林河（Sarin bira）等河流，因將軍衙門自二十二年，調查志書（jy šu bithe）時，清楚地記錄於檔案之中。霍倫河、薩林河、巴蘭河之間，有查喀喇庫峰（Cakarakū hada）、華札哈塔爾哈（Hūwajaha talha）。故將霍倫河、巴蘭河、薩林河、查喀喇庫峰、華札哈塔爾哈，繪入黑龍江之圖有誤。兔乎魯河（Tuhuru bira）、格爾比河（Gerbi bira）、阿瑪爾河（Amal bira）、西穆爾河（Si mur bira）、衣母河（Imu bira）、魯庫河（Luku bira）、薩穆尼河（Samnin bira）、鈕瓦克坦河（Niowaktan bira）、阿薩里尼河（Asarni bira）、磨尼可河（Munike bira）、塔林河（Talin bira）、廟灣山（Miyoo wan alin）、乜米勒河（Miyemile bira）、厄兒何懇河（Elgeken bira）、畢瞻河（Bijan bira）……青吉特山（Cinggite alin）、乞啓琴河（Cicakin bira）、威爾吉河（Wergi bira）、鄂爾奇勒山（Elkire alin）、都奇河（Duki bira）、斗色山（Deose alin）、揚山（Yang alin），位於我等（黑龍江將軍）所屬境外，屬於將軍屬地之畢瞻河（Bijan bira）、奇穆尼河（Kimnin bira）、哈魯河（Huru bira）、吉林河（Girin bira）、伊米勒河（Imile bira）、亨滾河（Henggun bira）之源流位於赫門河（Hemen bira）匯入之哈打五而河（Hada ul bira）東方，故未繪入我等圖內。爲此將軍宗室楊福（Yangfu）、副都統宗室勒色里（Leseri）咨文。<sup>110</sup>

以上文書，明確說明了這些河流不屬黑龍江將軍轄區，屬於境外，即屬寧古塔將軍轄區。漢文相關記載如下：

109 《柳邊紀略》卷 1，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國分界，天子命鑲藍旗固山額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遼入，所見皆同〔時方六月，大東海尚凍〕。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爾喀文。

有關分界碑，參看吉田金一，〈郎談の吉林九河図とネルチズスク条約〉，頁 62-63。劉遠圖，〈《柳邊紀略》所記威伊克阿林界碑補證〉，頁 132-135。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問題——ネルチズスク条約の研究——』，頁 102-104。

110 《黑龍江檔》16-25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寧古塔將軍、伯都訥副都統、土謝圖親王、扎薩克圖郡王、索賚特、杜爾伯特咨文抄檔》十月二十一日由驍騎校珠魯克遞送文書。

《一統志B》卷四十五，吉林載：額密勒河，在城東北三千八百七十八里，源亦出穆岱山。

又，《盛京通志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密密勒河，城東北三千八百七十八里，源出穆岱山。

按，兩書記載用字略有區別，其餘皆同。

#### 6 乞啓琴河 (Cicakin bira)

《口外九大人圖》作 Cicakin bira，《皇與圖》作乞啓琴河。按滿文可記爲乞查琴河。d'Anville (1732) 作 Tchitcha kim R。

此河屬於寧古塔將軍轄區。在《原任內大臣郎談繪製後帶來圖》內，乞啓琴河畫在此圖東北。<sup>111</sup>

據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咨文寧古塔將軍衙門。將軍衙門咨稱：兵部轉來內閣一統志館咨稱，黑龍江將軍送來之九路圖 (Uyun jugūn i nirugan) 中，鄂謨吞湖 (Omoton omo)、雅圖河 (Yatu bira)、札里河 (Jari bira)、洪果河 (Honggo bira)、哈魯河 (Halu bira)、札庫達穆圖河 (Jakdamtu bira)、吳穆魯河 (Umulu bira)、哈穆齊河 (Hamci bira)、霍河 (Ho bira)、圖魯河 (Turu bira)、阿西克塔河 (Asikta bira)、畢瞻河 (Bijan bira)、奇穆尼河 (Kimnin bira)、瑚魯河 (Huru bira)、吉林河 (Girin bira)……青吉特山 (Cinggite alin)、兔乎魯河 (Tuhuru bira)、乞啓琴河 (Cicakin bira)、磨尼可河 (Munike bira)、Asarai 河、威爾吉河 (Wergi bira)、Imile 河、Elkire 山、斗色山 (Deosealin)、揚山 (Yang alin)、哈打五而河 (Hada ul bira)、此等山河皆爲寧古塔將軍統轄之奇勒爾 (Kileri)、赫真 (Hejen)、費雅喀 (Fiyaka)、格依克勒 (Geikele)、瑚什哈喇 (Husikar) 姓之新滿洲 (Ice manju)、瓜爾察 (Guwalca) 等居住捕貂之處。<sup>112</sup>

#### 7 厄兒何懇河 (Elgeken bira)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Elgeken bira，《皇輿圖》作厄兒何懇河，《一統志A》

<sup>111</sup> 《黑龍江檔》16-21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來文抄檔》正月初四日由卜魁丁齊蘭寶遞送文書。

<sup>112</sup> 《黑龍江檔》16-25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寧古塔將軍、伯都訥副都統、土謝圖親王、扎薩克圖郡王、索賚特、杜爾伯特等咨文抄檔》九月二十二日由筆帖式散珠 (Sanju) 遞送文書。

作二格懇河，《戰蹟圖》作額勒赫懇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滿文檔案載：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內磨尼克河之東，有厄兒何懇河，此河自北向南，流入兔乎魯河。<sup>113</sup>

《一統志B》卷四十五，吉林載：額勒赫肯河，在城東北三千九百四里，源出催馬山，俱東流入圖呼爾河。

《盛京通志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額勒赫肯河，國語，額勒赫肯，從容也。城東北三千九百四里，源出催馬山，東流入圖呼爾河。

按，《盛京通志B》補國語釋義，其餘皆與《一統志B》同。

#### 8 磨尼可河（Munike bira）

《口外九大人圖》作 Munike bira，《吉林九河圖》作 Munike bira，《皇輿圖》作磨尼可河，d'Anville (1732) 作 Monike R。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滿文檔案載：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內磨尼克河之北，有乜米勒河，此河自北向南，流入磨尼克河。<sup>114</sup>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穆尼克河，在城東北三千八百四十八里，源出穆岱山。

《盛京通志 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記載與《一統志 B》同。

#### 9 廟灣山（Miyoo wan alin）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Miyoo wan alin。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滿文檔案載：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內塔林河和穆尼克河之間，有廟灣山。<sup>115</sup>

廟灣山為塔林河源流，具體見以下資料。

《一統志 A》卷三十五，寧古塔載：又塔林河，在城東北三千七百八十五里，源出廟灣山。

<sup>113</sup> 同上。

<sup>114</sup> 同上。

<sup>115</sup> 同上。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塔林河，在城東北三千七百八十五百源出廟灣山。又《吉林通志》卷十九，輿地志，三姓城載：廟灣山，三姓界，在寧古塔城東北三千八百三十七里。混同江口之北，即廟兒山也。

#### 10 塔林河（Talin bira）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Talin bira，《一統志 A》作塔林河，《一統志 B》作塔林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滿文檔案載：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內阿薩里尼河，穆尼克河之間，有塔林河。此河自西北向東南，流入兔乎魯河。<sup>116</sup>

另見上述9《一統志 A、B》記載。

《盛京通志 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記載與《一統志 B》同。

#### 11 阿薩里尼河（Asarni bira）

《口外九大人圖》作 Asarni bira，《吉林九河圖》作 Asarni bira，d'Anville (1732) 作 Asserni R，《一統志》作阿薩里河。

據《烏喇等處地方圖》，該河位於塔林河西，自北向南流入兔乎魯河。

#### 13 鈕瓦克塔河（Niowakta bira）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Niowakta bira，按滿文漢字可記為鈕瓦可塔河。《一統志 A》作牛瓦塔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載：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內……威爾吉河和阿薩里尼河之間，有鈕瓦科塔河。此河自西北向東南，流入兔乎魯河。<sup>117</sup>

《一統志 A》卷三十五，寧古塔載：牛瓦塔河，在城東北三千七百四十五里，源出庫木納神山，東流入圖乎魯河。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鈕幹哩河，在寧古塔城東北三千七百四十五里，源出庫穆訥神山，東流入圖呼勒河。

<sup>116</sup> 《黑龍江檔》16-25《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寧古塔將軍、伯都訥副都統、土謝圖親王、扎薩克圖郡王、索賚特、杜爾伯特等咨文抄檔》九月二十二日由筆帖式散珠遞送文書。

<sup>117</sup> 同上。

《盛京通志 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鈕幹哩河，國語，鈕幹哩，青綠也。城東北三千七百四十五里，源出庫穆訥神山，東入圖呼勒河。

按；該河名稱，最早自 Niowakta bira，逐漸到後期衍生為鈕幹里河。皆為同一河流之不同時代異稱。《盛京通志 B》補國語釋義，牽強附會。其餘皆與《一統志 B》同。

### 13 威爾吉河（Weigi bira）

《口外九大人圖》作 Wergi bira，《皇輿圖》滿文作 Wergi bira，漢文作密而即河，d'Anville (1732) 作 Ouergui R。此外，《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康熙四十九年前後各冊檔皆記為 Wergi bira，惟該圖記作 Weigi bira，疑為筆誤。

見 12 相關記載。據《烏喇等處地方圖》，該河位於鈕瓦克塔河之南，自北向南流入兔乎魯河。

### 16 兔乎魯河（Tuhuru bira）

《口外九大人圖》作 Tuhuru bira，滿文標註在源流處，與他圖迥異。《吉林九河圖》作 Tuguru bira，《皇輿圖》作兔乎魯河，d'Anville (1732) 作 Touhourou Pira，《一統志 A》作圖乎魯河，《戰蹟圖》作圖瑚嚕河，《一統志》作圖呼勒河，《吉林通志》作圖瑚魯河。以上不同漢字，皆為滿文同音異寫。

康熙三十四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載：自墨爾根城東南角至黑龍江、松花江交匯處二千里。東北角至入海至兔乎魯河五千里。<sup>118</sup>

《一統志 A》卷三十五，寧古塔載：圖乎魯河，在城東北三千六百餘里，混同江口之北，源出東北無名山，東南流，會牛瓦塔、阿薩爾泥等河，折東北入於海。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圖呼勒河，在寧古塔城東北三千六百餘里，混同江口之北。源出東北無名山，東南流會鈕幹哩、阿爾薩尼等河，折東北入於海。

《盛京通志 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圖呼勒河，蒙古語，圖呼勒，牛犢也。東北三千六百餘里，混同江口之北，源出東北無名山，東南流，會鈕幹哩、阿爾薩尼等河，折東北入於海。

<sup>118</sup> 《黑龍江檔》5-4 《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吏、刑、理藩院、盛京兵、刑部行文抄檔》（五月十二日）是日，令領催法萊（Falai）遞送文書。

按，《盛京通志 B》補蒙古語釋義，其餘皆與《一統志 B》同。

### 17 伊米勒河 (Imile bira)

《口外九大人圖》作 Imile bira，《吉林九河圖》作 Imilen bira，《皇輿圖》作厄米勒河。按滿文可記爲伊米勒河。d'Anville (1732) 作 Ymile Pira，《一統志 A》作衣密勒河，《水道提綱》作厄米勒河。《吉林通志》卷二十作額彌勒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載：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內亨滾河之北，有格爾比河。此河自西南向東北，流入伊米勒河 (Imile bira)。伊米勒河東北有阿瑪河 (Ama bira)，此河自東北向西南，流入伊米勒河。伊米勒河東北有西穆爾河 (Si mur bira)，此河自東北向西南，流入伊米勒河。<sup>119</sup>

《一統志 A》卷三十五，寧古塔載：衣密勒河，在城東北三千四百四十一里，源出寧捏山，東南流入亨滾河。

案，圖中繪爲流入 (8) 穆尼克河。

《盛京通志 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額密勒河，國語額密勒，雄也。城東北三千四百四十一里，源出寧聶哩神山，東南入興衰河。

滿文 Imile bira，自原來記載的漢文衣密勒河，逐漸統一成額密勒河，其詞義也以假託滿文 Emilen (雄) 來註釋詞義，漸趨牽強附會。

《黑龍江檔》康熙二十三年記載了大清國遠征軍進兵亨滾河時，得知俄羅斯此春溯亨滾河攀越山嶺，向北海逃去的消息後，當年六月初八日大軍抵達伊米勒河口，續而抵達河源，探訪奇勒爾人，了解地理情形的史實。<sup>120</sup>

### 18 格爾畢河 (Gerbi bira)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Gerbi bira。《一統志 A》作葛爾必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載：亨滾河之北，有格爾畢河。此河自西南向東北，流入伊勒河。<sup>121</sup>

<sup>119</sup> 《黑龍江檔》16-25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寧古塔將軍、伯都訥副都統、土謝圖親王、扎薩克圖親王、索賚特、杜爾伯特咨文抄檔》九月二十二日由筆帖式散珠遞送文書。

<sup>120</sup> 《黑龍江檔》1-1 《自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起行文抄檔》八月十八日鑲紅旗閑散章京牛莫順 (Niomoūon) 遞送文書。

<sup>121</sup> 《黑龍江檔》16-21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部、理藩院、盛京兵部來文抄檔》八月二十三日由齊蘭寶遞送文書。

《一統志 A》卷三十五，寧古塔載：葛爾必河，在城東北三千四百六十七里，源出傲西克特山，東北流入衣密勒河。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噶勒畢河，在東北三千四百六十七里，源出鄂錫克特山，東北流入額蜜勒河。

《盛京通志 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噶勒畢河，國語，噶勒畢，耳聰也。城東北三千四百六十七里，源出鄂錫克塔山，東北流入額密勒河。

按，《盛京通志 B》補國語釋義，其餘皆與《一統志 B》同。

#### 19 阿瑪爾河 (Amal bira)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Amal bira。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阿穆爾河，在城東北三千五百六里，源出瑪庫山，西流入額密勒河。

《盛京通志 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阿穆爾河，蒙古語，阿穆爾，平安也。城東北三千五百六里，源出瑪庫山，西流入額密勒河。

按，《盛京通志 B》補蒙古語釋義，其餘皆與《一統志 B》同。

#### 20 西穆爾河 (Si mur bira)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Si mur bira。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載：伊米勒河東北、有西穆爾河。此河自東北向西南，流入伊米勒河。<sup>122</sup>

據《烏喇等處地方圖》，該河位於（19）阿瑪爾河南，源出瑪庫山，西流入額密勒河。

#### 21 亨滾河 (Henggun bira)

《盛京通志 A》卷九，山川志作亨滾河，《口外九大人圖》作 Henggun bira，《吉林九河圖》作 Henggun bira，《皇輿圖》作亨滾河，d'Anville (1732) 作 Henkon Pira，《一統志 A》作亨滾河，《戰蹟圖》作興衰河，滿文作 Hing gun bira，《水道提綱》及《吉林通志》均作亨滾河。

---

<sup>122</sup> 同上。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記載：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內……亨滾河以西，有都奇河（Duki bira），此河自西向東，流入亨滾河。再，亨滾河東源稱之為赫門河（Hemen bira）。此河自西北向東南流，成為亨滾河。<sup>123</sup>

此二河未繪入《烏喇等處地方圖》內。

《盛京通志 A》卷九，山川志載：亨滾河〔在夏哩河之東，其源莫考，南流入混同江〕。

《雍正十二年行文檔》記載：亨滾河，距寧古塔兩千八百里。乘船由水路溯流而上五十五日，順流二十八日路程。源自東北二千七百五十里之亨滾窩集（Henggun i weji）南流至寧古塔二千八百里，匯合至松花江〔源流自陸路五百里，水路七百里〕。<sup>124</sup>

《鄂多理城寧古塔城地域檔》記載：亨滾河（Henggun），位於夏哩河（Hiyari bira）之東，向東北流入黑龍江。

《一統志A》卷三十五，寧古塔載：亨滾河，在城東北二千七百三十里，源出卓爾齊山，東南流，會諸小水，入混同江，當混同江入海之處，此水亦甚大。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興衰河，在寧古塔城東北二千七百三十四里，源出卓哩幹山，東南流，會諸小水，入混同江，當混同江入海之處，此水亦甚大。

《盛京通志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記載同《一統志B》。

《水道提綱》卷二十四，黑龍江載：亨滾河，出羊山之東，隔嶺東麓曰亨滾色禽，東流二百餘里，合北來一水，東南流百數十里，合西南來一水。又東百餘里，合北來一水，行松漠中，東南二百餘里，有哈打五而河，西南自松林東流，合南水四，北水三，而東北流七百餘里來會。又東北行松林間，曲曲八百里，有厄米勒河，自西北合數水，東南流七百餘里來會，又東行二百里稍北，經衣思科路必而忒地之南，又東百餘里，至莽阿臣噶山之南，東入黑龍江。此水自東十七度八分，至東二十四度，源流幾二千里。

《吉林通志》卷二十二，輿地志十，山川載：又東北亨滾河，合數大水自西北

123 同上。

124 《寧古塔檔》2-9《雍正十二年行文檔》。

來注之。亨滾河或曰恒滾或曰興滾，一曰亨庚，出揚山。其北即外興安嶺南麓，北即康熙中與俄羅斯分界處也。河出揚山之東，隔嶺東麓曰亨滾尼河。源東流二百餘里，合北來一水，東南流百數十里，而合有哈達烏呼河，自南來注之〔河出尼滿河源之北，中隔大嶺，自嶺北麓北流有西來二水合爲一，東注之。次北又一水自西來注之。又北三百餘里注興滾河〕。又東南流有額彌勒河，自西北來注之〔河一作厄彌勒，盛京通志別出之，以爲二水，非也。源出寧古哩神山，南流百餘里，有亨庚窩集之水合二水，自西北來合爲一。東南流百餘里入興滾河。亨庚窩集水蓋興滾河之別流也〕。又東南流有魯庫河〔河出楚查馨河〕、薩穆尼河〔河出九文山〕。自北來伊穆河〔河出揚古岱山〕、達拉哈河〔河出庫爾布山〕，自南來左右交注之，又東南流經集達特噶城之東南，注混同江源流幾二千里。（〔 〕內爲原文按語）

最早介紹亨滾河有關的滿文檔案，當推楠木賢道〈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からみた康熙23年の露清關係〉中的史料6、12、15、16、21、22、26（羅馬字轉寫和日譯文）。該文書時間爲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由筆帖式霍托（Hoto）遞送文書。其中，詳述大清國遠征亨滾河俄羅斯時，遠征軍在冰天雪地中，迎面遭受狂風大雪，受困無法前行，未能按期返回的窮迫情形。<sup>125</sup>

## 22 魯庫河 (Luku bira)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Luku bira，《一統志A》作魯庫河，《吉林通志》卷二十作魯庫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記載：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內……亨滾河之北，有魯庫河。此河自北向南，流入亨滾河。<sup>126</sup>

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雍正十二年行文檔》八月十九日，驛丁陳子貴由驛站遞送文書載：

亨滾河，位於寧古塔城二千八百里之外，水路由獨木舟上溯五十五日日程，順流二十八日程，源自東北二千七百五十里之亨滾窩集，向南流出，注入自寧古塔二千八百里處之松花江〔源流自陸路五百里，水路七百里〕。<sup>127</sup>

125 《歷史人類》，第 24 號，頁 29-82。

126 《黑龍江檔》16-25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寧古塔將軍、伯都訥副都統、土謝圖親王、扎薩克圖郡王、索賚特、杜爾伯特咨文抄檔》九月二十二日由筆帖式散珠遞送文書。

127 《寧古塔檔》2-9 《雍正十二年行文檔》八月十九日驛丁陳子貴由驛站遞送文書。原文 henggun

《一統志 A》卷三十五，寧古塔載：魯庫河，在城東北三千二百八十三里，源出楚查琴山，南流入亨滾河。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魯庫河，在城東北三千二百八十三里，源出楚察馨山，南流入興袞河。

《盛京通志 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魯庫河，國語。林茂草密也。城東北三千二百八十三里，源出楚察馨山，南流入興袞河。

按，《盛京通志 B》除補國語詞義外，其餘記載同《一統志 B》。

《吉林通志》卷二十二，輿地志十，山川載：又東南流有魯庫河〔河出楚查馨河〕。

### 23 哈打五而河 (Hada ul bira)

《口外九大人圖》作 Hada ul bira，《吉林九河圖》作 Hada ul bira，《皇輿圖》作哈打五而河。d'Anville (1732) 作 Hataoul Pira，《戰蹟圖》作哈達武勒河。《吉林通志》卷二十，作哈達烏埒〔哈達，峰也。烏埒，灰條菜也〕。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記載：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咨文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齊齊哈爾城之東松花江、黑龍江交匯。北岸有將軍所屬畢瞻河 (Bijan bira) 接境。以東北角為將軍所屬，會同俄羅斯為界之兔乎魯河之西南，與哈打五而河源接境。等因。繪入圖中。<sup>128</sup>

據《烏喇等處地方圖》記載，此河位於伊穆河北，東北流入亨滾河。

### 24 衣母河 (Imu bira)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Imu bira，《皇輿圖》作衣母河，《一統志 A》作衣母河，《戰蹟圖》作伊穆河，《吉林通志》卷二十作伊穆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載：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

---

bira, ninggutai hoton i juwe minggan jakūn tanggū ba i dubede bi, mukei jugūn weihu i wesime/ susai sunja inenggi, wasime orin jakūn inenggi on, sekiyen/ dergi amargi juwe minggan nadan tanggū susai ba i henggun i/ weji ci tucifi, julergi baru eyeme, ninggutaci juwe minggan jakūn/ tannggū ba i sunggari ula de acaha, [ sekiyen olgon jugūn sunja tanggū ba,/ mukei jugūn nadan tanggū ba] 。

128 《黑龍江檔》16-25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寧古塔將軍、伯都訥副都統、土謝圖親王、扎薩克圖郡王、索賚特、杜爾伯特咨文抄檔》十月二十一日由驍騎校珠魯遞送文書。

內……亨滾河之南，有衣母河。此河自西南向東北，流入亨滾河。<sup>129</sup>

《一統志 A》卷三十五，寧古塔載：衣母河，在城東北三千一百四十八里，源出陽武喀山，東北流入亨滾河。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伊穆河，在城東北三千一百四十八里，源出揚古岱山，東北流入興衰河。

《盛京通志 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內容同《一統志 B》。

#### 25 薩穆尼河 (Samnin bira)

《吉林九河圖》黃簽作 Samnin bira，《一統志 A》作薩木寧河，《吉林通志》作薩穆尼河。

康熙四十九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載：看《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送來圖》內……亨滾河之北，有薩穆尼河。此河自北向南，流入亨滾河。<sup>130</sup>

《一統志 A》卷三十五，寧古塔載：薩木寧河，在城東北三千八十八里，源出九文山，俱南流入亨滾河。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薩穆尼河，在城東北三千八十八里，源出九文山，俱南流入興衰河。

《盛京通志 B》卷二十七，山川，吉林各屬：薩穆尼河記載同《一統志 B》。

#### 26 薩哈連烏喇 (Sahaliyan ula)

《皇輿圖》作黑龍江、薩哈連烏喇，杜赫德《中華帝國誌》第四卷，第九圖西北部，黑龍江南岸註有法文「該河莫斯科瓦人稱之爲阿穆爾 (Amur)，中國人 (Chinois) 稱黑龍江 (He long kiang)，中國韃靼人 (Tartares Chinois) 稱薩哈連烏喇 (Saghalien oula)」，《戰蹟圖》作黑龍江。

《盛京通志 A》卷九，山川志載：黑龍江，城東北一千二百餘里，即薩哈連江也。明一統志云：黑龍江源出北山，南流入松花江。今按此江源出西北塞外，山名莫考。東南流並混同江入海。又按金史帝紀混同江，一名黑龍江，水微黑，故名。然混同江之源出自長白，黑龍江出自塞北，前史就二水河流之處言之也。

129 同上，九月二十二日由筆帖式散珠遞送文書。

130 同上。

《雍正十二年行文檔》八月十九日驛丁陳子貴由驛站遞送文書載：黑龍江，位於寧古塔城一千二百里之外，單騎十二日程，獨木舟上溯十六日程，順流十一日程，自西北流入松花江。<sup>131</sup>

《一統志 B》卷四十五，吉林載：黑龍江，在寧古塔城東北一千二百里，自黑龍江將軍界流入，至此與混同江會流入海。

上述山川，自康熙二十九年巴海經過視察之後，到了康熙四十九年又進行了收集調查黑龍江及寧古塔方面的地理狀況。其主要一個原因是，在編纂《大清一統志》時，發現了不少記載遺漏和矛盾之處，故又令各地開始重新復查。康熙四十九年二月黑龍江將軍衙門咨文墨爾根副都統六哥等人的一份文書，可以了解到具體的探訪調查工作。略譯如下：

亨滾河……哈打五而河、伊米勒河、威爾吉河、阿薩里尼河、穆尼克河、乞啟琴河……烏第河、兔乎魯河等河未曾調查送來。又汝等調查十八城時，送來里數外，未記源流至匯合處里數。此等文書寄達後，儘速查清送來。為此咨文。<sup>132</sup>

由將軍衙門傳令黑龍江副都統等人調查十八城，並寄來道里程數，原來但未記河流的源流到匯合處里數等由，復令儘速查明。此外，同月，將軍、副都統咨文黑龍江副都統，副都統寄來的文書中如此寫到：

多索米河 (Dosomi bira)、哈打五而河 (Hada ul bira)、亨滾河 (Henggun bira)、塔克提河 (Taktin bira)、伊米勒河 (Imile bira) ……威爾吉河 (Wergi bira)、阿薩尼河 (Asarni bira)、穆尼克河 (Munike bira)、乞啟琴河 (Cicakin bira)、兔乎魯河 (Tuhuru bira) 以及黑龍江源流 (Sahaliyan ulai sekiyen)，眾人皆稱不知。查核自部送來《原任內大臣郎談調查九路圖》 (Dorgi amban bihe Langtan i baicaha uyun jugūn i nirugan) 之事，為內廷要務，不得以不知敷衍。此等事宜訪問查清隨行原任內大臣郎談之文武官員，傳文送來。再，倘前往之人言稱不知，連

<sup>131</sup> 《寧古塔檔》2-9 《雍正十二年行文檔》八月十九日驛丁陳子貴由驛站遞送文書。原文 sahaliyan ula, ninggutai hoton i emu minggan juwe tanggū ba i dubede bi,/ kaidu morin i juwan juwe inenggi on, weihu i wesime juwan 337//338 ninggun inenggi, wasime juwan emu inenggi on, wargi amargici eyeme/ sunggari ula de acaha, [ ubade loca be seremšeme/ karun tebuhe bihe, ] 。

<sup>132</sup> 《黑龍江檔》16-24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龍江副都統、墨爾根城協領、索倫總管、驛吏等行文抄檔》二月初九日咨行筆帖式卜魁驛丁齊蘭寶。

夜儘速送來。為此咨文。<sup>133</sup>

康熙四十九年的地理調查，不僅參考《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後帶來圖》，還參照《原任內大臣郎談調查九路圖》進行了復查河流的工作。並不時訪談康熙二十九年隨同郎談等人前往視察人員，了解具體情況。康熙四十九年十月，黑龍江將軍咨文寧古塔將軍的一份文書中如此記載：

兔乎魯河、格爾必河、阿瑪爾河、西穆爾河、伊穆河、魯庫河、薩穆尼河、鈕瓦可塔河、阿薩里尼河、穆尼克河、塔林河、廟灣山、也米勒河、厄爾何懸河、畢瞻河……乞啟琴河、威爾吉河……為我等境外，屬於（寧古塔）將軍轄地。畢瞻河位於亨滾河源之赫門河，流入哈打五而河之東。我等未繪入圖內。為此將軍宗室楊福、副都統宗室勒色里咨文。<sup>134</sup>

這說明上述山川皆為寧古塔將軍轄區，這些地區為寧古塔將軍管轄下的奇勒爾（Kileri）、赫真（Hejen）、費雅喀（Fiyaka）、格依克勒（Geikele）、瑚什哈喇（Husikar）姓之新滿洲（Ice manju）、瓜爾察（Guwalca）等人居住、捕貂之處。

以上山川名稱，康熙四十九年，重新調查該地位於寧古塔城何方，幾里之先。若河川勘清源流，並記述流入什麼河流，吩咐相關人員，將以上山川河流、湖泊津渡等項查清後，盡悉增補繪入輿圖內，繕寫成檔。如此反復調查東北各地理狀況，新的調查資料不斷送到編纂一統志館，逐漸形成了大量的有關東北各地的方志資料，其中就包括了各種輿圖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間視察及反覆調查黑龍江等地的人文、地理等資料，並未反映在同一時代的漢文編纂資料以及方志資料之中。特別是滿文檔案內容，基本未編入漢文編纂資料之中，由此來看，有必要繼續深入挖掘相關資料。

## 結語

綜上所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烏喇等處地方圖》即為康熙二十九年巴海等

133 《黑龍江檔》16-24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黑龍江副都統、墨爾根城協領、索倫總管、驛吏等行文抄檔》二月二十六日咨行筆帖式伯爾赫（Berhe）。

134 《黑龍江檔》16-25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奉天、寧古塔將軍、伯都訥副都統、土謝圖親王、扎薩克圖郡王、索賚特、杜爾伯特咨文抄檔》十月二十一日令驍騎校卓爾庫遞送文書。

人，經三路視察黑龍江東北兔乎魯河流域後，繪製而成。康熙時期的滿文檔案一般都稱之為《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帶來圖》，這一滿文標題與我們現在看到的後人整理補加的漢文標題《烏喇等處地方圖》有別。依據滿文檔案，圖名亦可回復原名，稱之為《原任都統巴海繪製帶來圖》，統一圖文名稱，便於後人讀檔，亦不致混淆圖名。

另外，需要明確指出的是，該圖在滿文檔案中雖然出現「巴海繪製」等字樣，其實巴海只是負責監督繪製任務，並非親自繪製，這樣考慮的一個理由是，康熙二十九年巴海三路前往查勘圖中河流山川時，隨隊帶有畫匠等專業畫手。可惜的是，檔案資料未能給我們留下當年畫匠的名字，當時如何招募畫匠繪製輿圖等一系列問題，作為我們今後繼續探討的課題，有待將來深入研究。

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大清國實施的邊界視察制度，定期派出軍隊，專門視察是否有俄羅斯人越境，進入大清國領土生活。這種定期視察邊境的活動，逐漸成為一種制度，其後衍生為整個帝國處理邊界問題的一個模範。黑龍江以北地區的地理問題，也由此逐漸趨於明確化。不僅使從河流走向到源流，直到河流里數，山脈特徵、民俗以及農耕等各種人文地理方面要素有據可證，也為後人反復調查各地方志提供了寶貴的地理方面的資料。

康熙二十九年，巴海等人三路查勘兔乎魯河流域，在大清國政治史以及外交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從此也決定了大清國在兔乎魯河流域的國境問題和領土意識。近代意義上的國境概念的導入，畢竟和這個時期不能同日而語。康熙二十九年，大清國和俄羅斯帝國之間交涉之後，如何妥善處理國境問題，這一直是貫通整個大清國時代的一個重要課題。《烏喇等處地方圖》給我們展示了大清國在黑龍江下游東北部一帶的山川地貌，也為多年來議論不休的界碑問題，提供了一個更加可信、可觀的有力證據，即所謂的界碑，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一個事實。

滿文輿圖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歷代以來一直成為謎團的亞洲東北部，外興安嶺南北的地理狀況，煥然一新，逐漸走進世界輿圖史的畫頁之中。<sup>135</sup> 所以，研究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各種滿文輿圖，不僅對中國輿圖史帶來新的天地，也為重新思考和構築大清國歷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可觀的實物材料。不久的將來，隨著解讀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堅信這些深藏宮內封塵已久的滿文輿圖，逐漸解開神

135 滿文輿圖同歐亞輿圖及世界地圖的會合，筆者將另外撰文討論。

秘面紗，導引我們進入背後秘藏的遙遠的歷史時空。

謝辭：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查閱滿文檔案和輿圖資料，始終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劉錚雲教授（時任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處處長）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馮明珠教授的大力協助。解讀滿文輿圖原件時，承蒙盧雪燕女史、洪健榮、黃景彤等諸先生提供多方便利，受惠良多。本文利用的滿文輿圖，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郭美蘭和筆者共同完成解讀工作。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慨允本人利用院藏滿文輿圖撰寫論文。本文輿圖地名對照表內滿文，由遼寧省檔案館何榮偉館員提供製作，特此一併致謝。衷心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提供的寶貴意見。

## 附 錄

**史料1：《黑龍江檔》1-1《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起行文抄檔》八月十八日鑲紅旗閑散章京牛墨順（Niomošon）帶走文書**

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臣薩布素等謹奏，爲奏聞遣往亨滾之兵，降伏羅刹、奇勒爾事。營長楊古岱（Yanggudai）、喀圖虎（Kathū）等派章京咨呈，五月十七日抵達亨滾河口，十八日溯亨滾河時，奇勒爾（Kiler）之額木楚（Emcu）、蒙努（Mengnu）等告稱：我等妻子爲羅刹掠去，若逃出一兩人，我等親自在此守候。先前羅刹居住在亨滾（Henggun）、都齊（Duki）兩河之洲。今春冰融時，乘坐獨木舟，沿亨滾順流而下，溯伊米勒（Imile）河而上，自源流越過山嶺，往流向東北海方向的圖乎魯河（Tuhuru bira）方向行走等語。六月初三日，抵達伊米勒河口，參領等一同商議，停止逆溯亨滾，溯流依米勒河行走六日，看得水流湍急，河床狹窄，船隻不能運行。故詢問奇勒爾之赫濟訥（Hejine）等，告稱：自此至河源，皆依舊如此，船隻不可運行。故交付正黃旗委署參領滿舍吉（Manšegi）、鑲黃旗委署參領瓦喀納（Wakana）、鑲紅旗委署參領牛墨順（Niomošon）等官兵，一併乘坐我等獨木舟、奇勒爾之樺皮船，溯流至河源察看。圖乎魯河之方向，探尋循陸路越過行走之地。有越過山嶺之處，行抵圖乎魯河，查明有無羅刹，前來報告。當月初九日派遣。十日夜半，滿舍吉等派人前來告稱：羅刹在山嶺附近之依米勒河駐守，地勢密林叢生，是否築城居住，未能清楚見得等語。我等親率章京兵丁，攜帶神威將軍（炮）四，十三日抵達滿舍吉駐劄之地。翌日，前往包圍羅刹居住之卡倫進行捕捉，鑲紅旗委署參領牛墨順，正藍旗委署參領博墨多（Bomodo）等，正紅旗委署閑散章京喀楚（Kacu），鑲白旗委署閑散章京馬齊（Mací），正黃旗委署驍騎校吉墨格里（Gimgeri），正白旗委署驍騎校圖木珠（Tumju）交付兵丁六十人，編隊遣往圖乎魯河方向埋伏於逾越之地。若羅刹敗走經過時盡殺之。如若人數眾多，分路突進追殺等語。決定交付委署參領滿舍吉、鑲黃旗委署驍騎校哈喀喇、鑲紅旗委署領催博赫訥兵丁三十人、帶領七品官幹福納西（Ofunasi）等人，率先越過羅刹卡倫，紮營河邊，勸降羅刹，若羅刹不降，殺之等語。

由水路遣派正黃旗騎都尉安珠瑚（Anjuhū）、正藍旗委署驍騎惠沙（Hoiša），交付兵丁三十人、攜驍騎校伊凡（Ifan）前往。並吩咐若遇羅刹即可勸降，如若不降，殺之等語。

我等親自率領章京兵丁同時並進，各自同時抵達羅刹卡倫駐地，視之，羅刹察知盡皆逃竄。委署參領牛墨順等前來告稱：我等越嶺抵達其地，羅刹十餘人察知逃跑，追蹤活捉二人，其餘乘獨木舟渡河，進入森林逃走等語。

將抓獲二人送至我處，訊問：爾等何人？答曰：我等原駐劄圖乎魯河之奇勒爾（Kiler），跟同羅刹一起前來捕魚。遇軍被抓，此河之地區無羅刹居住。自此處步行，翌日可達有羅刹之圖乎魯河，有五十餘羅刹人築室而居等語。交付委署參領滿舍吉、委署驍騎校哈喀喇、博赫訥、驍騎校伊凡（Ifan）、七品官幹福納西（Ofonasi）等兵丁四十人，先前派遣埋伏。同委署參領牛墨順等一同抵達羅刹駐地包圍家舍，派伊凡、幹福納西等宣諭皇帝仁恩，說服降從。若不從，不得妄自攻伐，告知我等隨即抵達等語，遣人告知。當日滿舍吉，牛墨順等前來告稱：渡圖乎魯河行走時，遇持鎗羅刹一人，奇勒爾男丁一人，將其活捉等語。

我等親自率領章京兵丁，翌日尋滿舍吉等蹤跡，突進之時，遇羅刹一人持鳥槍前來，勸言降伏，不從，欲舉槍擊射，殺之。日落之後，安營駐劄。滿舍吉又派人前來相告：我等今日抵達羅刹駐地，遣伊凡、幹福納西等前去降伏羅刹，眾人皆歸順。降伏羅刹共四十七人，獲鳥槍五十一支，羅刹捉獲奇勒爾男丁一人，妻二，男子十二，女子三等。告知滿舍吉在原地等候。抵達之後，訊問降伏羅刹：汝等伙計有近一百人，其餘羅刹都在何處？答曰：「哈費里喇（Hafirila）之伙計近五十人羅刹越過大興安嶺（Ambar hinggan dabagan）前往找尋東北方之雅庫斯科義（Yagusekei）」。將羅刹抓獲之妻子，若帶送至大軍駐地，恐道路遙遠，奇勒爾等不易各自將妻子帶去。故宣諭主上恩威，交付給其父兄、丈夫等。

又，首次降伏原先未降之奇勒爾三十一戶之九十九丁。羅刹見大軍不動干戈就地降伏。深處山林，生如野獸之奇勒爾，聞知主上教化，眾人傾心向化，此皆賴皇帝隆恩鴻福。羅刹抵達之後，送至輕車都尉瑪喇處候旨。為此謹奏聞。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臣薩布素、副都統昇一品大臣溫岱、副都統臣雅泰納。

**史料2：《寧古塔檔》2-9《雍正十一年行文檔》八月十九日驛站丁陳子貴（Cen dži  
gui）乘驛送來之文**

寧古塔副都統咨文將軍衙門，爲查送事。……薩布素，寧古塔人，十八歲時，任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沙爾瑚達（šarhūda）衙門筆帖式（Bithesi），在任筆帖式八年期間，寧古塔各地大小事務，章京等委任以及應派事務，盡心效力，大受讚賞。順治十八年（1661），升任驍騎校。

康熙三年（1664），隨將軍巴海從征俄羅斯（Oros），五月初二日，赫哲（Heje）赫喇素彌村（Hilasumi gašan）地，俄羅斯船兵沿江紮營，薩布素首沖鑿戰，俘獲船一。此戰委派薩布素領兵，收服未降之費雅喀人（Fiyaka gurun）。首次降伏東海沿江居住索彌抵村（Somnin gašan）等九十九戶費雅喀人。此舉爲將軍巴海、副都統尼喀里（Nikari）大加讚賞，後牛彖章京（Nirui janggin）出缺，不必由京城派遣，預先行文兵部，擬將薩布素升任牛彖章京。後牛彖章京出缺，即保舉奏聞引見，任命牛彖章京。……康熙九年保舉奏聞引見，任命爲都統。

康熙十五年（1676），遷移東部（Dergi golo）新滿洲姓長（Ice manju halai da）扎努喀（Januka）、布克托（Bukteo）等戶至寧古塔之際，威濟肯河（Weijiken bira）內居住之輩，人丁健壯眾多，恐其輩不願遷徙作亂，特遣薩布素遷移居住在威濟肯河之克喇特（Kelate）等人之戶口，皆遷至寧古塔。此年遷移戶口兩千，男丁三千，人口共八千有餘。其新遷來之戶口，每戶提供住居、器皿、耕種農籽、每月口糧等雜物諸事，對有關刑問及駐防設置卡倫（Karun）、堆鋪（Juce）等事，晝夜不休，處理得當，從未有誤。薩布素親自率兵，前往諾羅（Noro）、西喇沁（Sirahin）、木倫（Muren）等地居住之姓長透車（Teoce）、達布圖（Dabtu）等五百餘戶，盡收遷移至寧古塔。聞知何耶姓（Heye hala）驍騎校巖祺喀（Yancika）之伙計（hoki）十五戶之人相商叛離，乘夜派兵前往鎮壓，盡獲之，送至京城。

康熙十八年（1679），上諭招薩布素至京城引見奏聞，升任副都統。康熙二十二年，副都統薩布素征討俄羅斯，率兵首次溯黑龍江出征。前往佔據雅克薩城至亨浪等地之俄羅斯之八艘船兵，在特爾德尼城（Teldeni hoton）相遇，就地包圍。宣諭聖上恩威，全部降伏，皆送至京城。進至額蘇里地，築土城以備越冬時，派遣鄂倫春（Oroncon）之朱爾鏗額（Jurkungge）、巴哈爾達（Bahalda）等人到各處鄂倫春之地，曉諭聖上遣發大兵，遷來殲滅俄羅斯。汝等現在不得爲俄羅斯貢

貂，逮捕或殲滅前來征貂皮，或前來汝等住所掠奪漁獵之俄羅斯殺之，將鳥槍送來，視鳥槍給予賞賜等。各地殺俄羅斯四十餘人，前來送交鳥槍，殺人者皆賞賜衣服一件等送之。

住西里木迪之俄羅斯，聞知大軍進兵黑龍江，駐扎在額蘇里，紛紛避走其國之烏第城（Udi hoton）。薩布素聞知欲遣兵往追，但路途遙遠，又無馬匹，令居住西里木迪之鄂倫春族長（Mukūn i da）吉爾木阿（Girmungga）、里克丁阿（Likdingga）等派人往俄羅斯行走之狹路處埋伏，俄羅斯行走之時，吉爾木阿、里克丁阿突然伏擊全部射死。為此奏聞，大賞吉爾木阿、里克丁阿等人。同年將副都統薩布素任命鎮守黑龍江將軍。康熙二十三年，派章京往居住於精奇里江（Jingkiri ula）之俄羅斯處，深入其地，盡悉降伏，俘獲者送至京城。又派章京率兵往居住亨滾（Henggun）之俄羅斯處，兵馬未到之前，眾皆逃竄至彼國烏第城（Udi hoton）。

派章京率兵赴東海沿岸之居住圖乎魯河（Tuguru bira>Tuhuru bira）俄羅斯，亦深入其地盡悉降伏，捕送京城。原先未降伏之奇勒爾（Kiler）百餘戶男丁，亦初次歸降，約定貢貂。康熙二十四年攻取俄羅斯雅克薩城時，盡拿活捉俄羅斯兩隊哨兵，就地分水陸兩地立營分攻，五月二十四日夜遣派火器營，二十五日乘夜將軍薩布素親率一隊兵馬，緊逼城西北角，放火箭急攻，及至已時，降伏俄羅斯頭目額里克謝耶（Elikšei）等官兵六百餘人。遵照諭旨，放回願歸彼國之人，自願降伏之人，暫歸頭目伊凡（Ifan）管理，續而降伏之頭目巴實里（Bašili）等四十餘人，送至京城……。

**史料3：《黑龍江檔》16-21 《自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吏、兵、理藩院、盛京兵部行文  
抄檔》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由齊蘭穆寶（Cilamboo）遞送文書**

內閣一統志書編纂館咨行兵部司武廳，爲前往視察事。黑龍江將軍咨稱：齊齊哈爾東方至海五千五百里處與海相接。看圖（Nirugan）內齊齊哈爾東方並無與海相接。東方疆界是否與海相連，詳查送來。東南角至黑龍江、松花江交匯處，兩千三百里，與寧古塔將軍轄境相接。看圖內黑龍江、松花江交匯處，位於齊齊哈爾城東北。兩江交匯處，是否可以齊齊哈爾城之東南爲界，查清送來。東北角至入海之兔乎魯河，有五千五百里，同俄羅斯接境。送來之檔冊中，稱兔乎魯河周圍山河等諸項爲寧古塔轄區，何故又以齊齊哈爾東北角等地爲界，是否正確，查清送來。又，看送來的圖內寧古塔、吉林烏喇、俄羅斯、蒙古等地山河等合併繪圖送來。將此咨行黑龍江將軍，命黑龍江將軍繪來轄內之地，其他不必繪製。檔冊內記載，魁山（Kui alin）位於城西，哭勒乞勒河（Kurkiru bira）位於城西北。看圖內魁山位於哭勒乞勒河之北，查清送來魁山、哭勒乞勒河位於城之何方。檔冊內記載，西南角至科爾沁、紮賚特界之哈達漢河（Hadaikan bira）二百里，同紮賚特接境。又，哈達漢河出自城西之呀克山（Yak alin），向東南流二百餘里，在城西之一百三十里外，同雅兒河（Yal bira）交匯。哈達漢河或位於二百里外，或位於一百三十里之外，或位於城之西南，或位於城西之處，查明送來。記載拖里兒哈達（Toril hada）爲九百六十里，博庫里山（Bokuri alin）爲七百里。看圖內拖里兒哈達、博庫里山均位於黑龍江沿岸，相隔不遠，而里數懸殊迥異，查明里數送來。翁厄河（Ungge bira）記在城東。看圖內位於東北，孰謂正確，查明送來。殿牛河（Tiyenio bira），琴都（Kindu）、泥寧（Ningni）三河均記爲二千七百里之外，三河之間是否相隔不到二里。看圖內其間遠近亦相隔有別，查清里數送來。二哥河（Elge bira）、博魯母打河（Boromda bira）均記在東北方，看圖內在北方。究竟在何方查明送來。在格爾必齊河源流（Gerbici bira i sekiyen）處，有同俄羅斯（Oros）議定分界石碑。此石碑位於齊齊哈爾城何方幾里之外？位於格爾必齊河之何方岸邊，將此查明，繪寫增入圖內送來。西北角至厄勒枯挪河（Ergune bira）爲止二千里。又記厄勒枯挪河在城之西北二千九百里之外，流入黑龍江（Sahaliyan ula）。厄勒枯挪河位於二千里之外，或位於二千九百里之外，將此查明送來。喀兒喀河（Kalka bira）、烏順河（Ušun bira）、烏藍佈拉克泉（Ulan bulak šeri）均記爲位於一千三百里之外，此等河流、湖泊，是否確爲相隔二里？看圖內亦遠近相隔有別，查明里數送來。圖內只繪呼倫鄂模（Hulun

omo)、布育里鄂模 (Buyur omo)、忒里庫勒哈達 (Terkule hada)、朮得赫山 (Judehe alin)、蘇庫都里奇山 (Sukduliki alin)、圖勒爾山 (Tuler alin)、拖呵河 (Tok bira)、呀克山 (Yak alin)、衣兒呼里山 (Ilhūri alin)、嫩泥烏喇 (Non i ula)，檔冊內未記位於齊齊哈爾城之何方幾里之外，以上山、峰、江、河位於城之何方幾里之外？又，拖呵河源流出自何方？流向何方匯入何地，一併查清送來。又，黑龍江將軍轄區內之河流，已送來河口之里數，未將河床位於齊齊哈爾城之幾里之外寫來。查清河床位於城之何方，幾里之外，增寫入檔送來。將董鄂羅河源 (Donggoro birai sekiyen) 記為出自東北興安 (Hinggan)，喀那河源 (Kana birai sekiyen) 記為出自北興安。看圖內此二河源均為同向，何以記為二種？究竟出自何方，查明送來。記衣克古克達山 (Ike gokdo alin) 位於興安山梁 (Hinggan i mulu)，此山或位於興安山梁，或位於興安山 (Hinggan i alin)，何方之山稱之為興安山梁，何方之山稱之為興安山？查清送來。看圖內敖肯河 (Oken bira) 位於齊齊哈爾城近處七百里，而遠處查克達齊山 (Jakdaci alin) 記為六百六十里。多浦哭里河 (Dobkūr bira) 又遠，記為六百三十里，各泥河 (Geni bira) 且近，而記為七百里。必拉河 (Bira bira) 近，而記為八百里。奇威兒河 (Giwel bira) 遠，而記為七百里。牛滿河 (Nioman bira) 近，反而記為一千七百五十里，西札兒滿河 (Sijarman bira) 遠而記為一千三百七十里。幹倫奇河 (Olongki bira) 且遠，而記為一千里。喀羅里 (Kalur bira) 近，而記為一千二百里。衣克車勒克齊鄂模 (Ikecelekci omo) 遠，而記為一千里。詳查自此以上山河、湖泊之里數具送。看大圖 (Ambar nirugan) 內，齊齊哈爾城東北之羅拉喀河 (Lolaka bira) 東有納巖城。納巖城之東有烏得楞河 (Udelen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入納莫里河 (Nemer bira)，甲里河 (Giyar bira) 之東，有查衣河 (Jai bira)，此河自西南向東北流入黑龍江。蘇兒西哈達 (Sulasi hada) 之東，有麒麟河 (Kilin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入黑龍江。麒麟河之東，有茂哈達 (Moo hada)。枯育魯河 (Kūyur bira) 之東，有酥魯河 (Sur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入黑龍江。必占河 (Bijan bira) 之東，乞母泥河 (Kimnin bira) 之西有莫里河 (Moli bira)，此河自黑龍江分出東流，復流入黑龍江。牛滿河源之東，有西里母的河 (Silimdi bira)，此河自東北向西流入牛滿河。牛滿河源之西有烏爾噶勒河 (Urgal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入牛滿河。黑龍江之北，錦衣里江 (Jingkiri ula) 之西，有阿拉爾山 (Aral alin)，黑龍江之北，有厄蘇里 (Esuri)，此為對面一河分自黑龍江向東流，復匯入黑龍江。齊齊哈爾城北之多斯哈達 (Dosy hada) 之東，有模林河 (Morin bira)，此河

自東北向西南流入黑龍江。二哥河之東有必勒潭河（Birtan bira），此河自西北向東南流入黑龍江。錦衣里河之東，有烏勒格河（Urge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入錦衣里河。呼馬拉河（Hūmar bira）流入黑龍江。河口之東有呼馬拉城。呼馬拉河之南，有枯爾喀河（Kūrka bira）。枯爾喀河之西有窩勒克河（Weleke bira），此二河均自南向北匯聚在一起，流入呼馬拉河。窩勒克河之西，有他哈河（Taha bira），此河自西南向東北流入呼馬拉河。嫩泥烏喇（Non i ula）之東，有米乞里河（Micil bira）。此河自北向南會同莫魯里河，流入嫩泥烏喇。齊齊哈爾城西南之截兒河（Col bira）之北，有截兒城（Col hoton）。以上山、峰、河、城等未曾繪寫入檔冊、輿圖內，將此咨行黑龍江將軍，若為山、峰，將其位於齊齊哈爾城之何方？幾里？若為河流，源流出自何處？流入什麼河流？在城之何方？幾里之外？若為城，在城之何方？幾里之外？周圍幾里？門幾個？或磚城，或為木城，何國築建？盡行查明送來。又，厄蘇里或為河名，或地名，一併查來。將截兒河、截兒城劃為科爾沁之紮賚特貝子旗之領地送來。此等截兒河、截兒城、或為紮賚特旗之地，或為黑龍江之地，查明送來。

又，看《大圖（Ambar nirugan）》、《巴海繪製後帶來圖（Bahai nirufi gajihā nirugan）》內齊齊哈爾城東北，亨滾河西有圖吉河（Tugi bira），此河自西東流，匯入亨滾河。亨滾河東源稱之為赫門河（Hemen bira），此河自西北流向東南，成為亨滾河。亨滾河之北方有格爾必河（Gerbi bira），此河自西南流向東北，匯入伊米勒河（Imile bira）。伊米勒河之東北有額墨爾河（Emel bira），此河自東北流向西南，匯入伊米勒河。伊米勒河之東北有西穆爾河（Si mur bira），此河自東北流向西南，匯入伊米勒河。亨滾河之南方有衣母河（Imu bira），此河自西南流向東北，匯入亨滾河。亨滾河之北有魯庫河（Luku bira），此河自北向南流，匯入亨滾河。亨滾河之北有薩穆尼河（Samnin bira），此河自北南流，匯入亨滾河。威爾吉河（Wergi bira）和阿薩里河（Asarni bira）之間有鈕瓦克塔河（Niowakta bira），此河自西北流向東南，匯入兔乎魯河。塔林河（Talin bira）和磨尼可河（Munike bira）之間有廟灣山（Miyoo wan alin），穆尼克河之北有乜米勒恩河（Miyemilen bira），此河自北南流，匯入穆尼克河。穆尼克河之東，有厄兒何懇河（Elgeken bira），此河自北南流，匯入兔乎魯河。以上山河若為黑龍江所屬，繪入黑龍江圖和檔冊之中，並查明送來在城之何方幾里之外，源流出自何處，匯入什麼河流。再，將《黑龍江將軍繪製送來圖》、《原任都統巴海繪製送來圖》亦一併送來等語。我等大臣等告知，依議。等因。為此告知汝等大臣，

迅速送至黑龍江將軍處，詳細查明繪寫記檔送來。為此咨行。圖兩幅，七月三十日。收掌官（Bargiyara asarara hafan）納秦（Nacin）、劉寶柱（Liobooju）、敦柱（Donju）。將軍宗室楊福、副都統宗室勒色里（Leseri）閱畢上述三項，交付委事協領德奇（Deki），烏爾都（Uldu），防禦安奇（Anci），驍騎校古勒特依（Guretei）等。筆帖式王石達（Wang ši da）記。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清) 伊把漢等纂，《盛京通志》，32卷，京都：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近衛文庫藏康熙二十三年（1684）版。
- (清) 阿桂等撰，《欽定盛京通志》，130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
- (清) 齊召南編錄，《水道提綱》，28卷，乾隆四十一年（1776）。
- (清) 楊賓，《柳邊紀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清) 鄂爾泰等，《八旗通志初集》，8冊，東京：東洋文庫藏滿文版；長春：東北師範大學，1985年漢文版。
- (清) 錢儀吉等編，《清朝碑傳全集》1-5，臺北：中文出版社，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4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大清一統志》，342卷，乾隆九年（1744）。
- 《天下輿圖總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日滿文化協會關係雜件・設立關係附本邦ヨリ服部博士外8名渡満》，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5016055200，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 《北平ニ於ケル国立重要學術機關》，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H-0917，1937。
- 《吉林通志》，122卷，光緒十七年（1891）刊。
- 《盛京典制備考》，光緒四年（1878）刊。
- 《清太宗實錄》，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文版；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漢文版。
- 《欽定大清一統志》，424卷，乾隆二十九年（1764）。
- 《黑龍江檔》，滿文《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康熙朝）膠片。
- 《寧古塔檔》，滿文《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檔案》膠片。
- 《鄂多理城寧古塔城地域檔》，滿文，登錄號167538，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明清史料。
- 《口外九大人圖》，滿文，平圖021577，169cm×233cm，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吉林九河圖》，滿文，康熙五十年（1711）繪製，平圖021457，107.5cm×123cm，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皇輿全覽圖》，35幅，漢文木板。
- 《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41幅，滿文銅版。
-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蹟輿圖》，滿漢合璧，乾隆四十三年（1778）版，大連：大連  
圖書館藏。

Carte général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dressée sur l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faites sur les lieux par les RRPP Jesuites et sur les memoires particulières du P. Gerbillion par le Sr. d'Anville, 1732. (略稱：d'Anville (1732))

## 二、近代論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存箱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1985年2月13日。

王庸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新購輿圖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6卷4號，1932年7-8月。

王庸、茅乃文編，《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

王庸、茅乃文編，《國立北平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續編》，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7。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目錄》，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7。

田鵬，《中俄邦交之研究》，南京：正中書局，1937。

米鎮波，《清代中俄恰克圖邊境貿易》，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何漢文，《中俄外交史》，上海：中華書局，1935。

吳雪娟，〈館藏《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的價值分析〉，《黑龍江檔案》，1995年第1期，頁25-26。

吳雪娟，〈論滿文翻譯的歷史與現狀〉，《滿語研究》，2005年第1期，頁56-61。

吳雪娟，〈清代滿文輿圖概述〉，《滿語研究》，2006年第2期，頁49-52。

吳雪娟，《康熙滿文本《九路圖》與清代巡邊制度研究》，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李小文，〈王庸先生和他的著作〉，《文津流觴》，第16期，2006年3月，頁57-60。

李孝聰編著，《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

李孝聰編著，《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李孝聰，〈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藏清代輿圖的初步整理與認識〉，《故宮學術季刊》，25卷1期，2007年9月，頁151-174。

汪前進、胡啓松、劉若芳，〈絹本彩繪大明混一圖研究〉，《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頁51-55。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全3卷（《康熙皇輿全覽圖》、《雍正十排圖》、《乾隆十三排圖》），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史學年報》，2卷1期，1934年9月，頁155-167。

- 姜長斌，〈中俄國界東段的演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 孫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3。
- 孫皓，〈從兩幅地圖看18世紀初期清人對黑龍江流域的認識〉，《中國地方志》，2006年第6期，頁55-60。
- 張廣達，〈關於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彙》與見于此書的圓形地圖〉，《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第2期。後收入《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57-82。
- 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鈕仲勛、任金城、秦國經、胡榜波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 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鈕仲勛、任金城、秦國經、汪前進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 郭美蘭，〈熱河地圖 清宮珍品〉，《中國檔案報》，2003年9月26日。
- 華林甫，〈英藏清軍鎮壓早期太平天國地圖考釋〉，《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頁66-77。
- 華林甫，〈英國國家檔案館藏中國近代輿圖〉，《地圖》，2005年第1期，頁28-33。
- 黃時鑑、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劉官謄，〈內務府輿圖房藏圖紀要〉，《文獻論叢》，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1936，頁135-146。
- 劉若芳、汪前進，〈《大明混一圖》繪製時間再探討〉，《明史研究》，2007，頁329-355。
- 劉遠圖，〈《柳邊紀略》所記威伊克阿林界碑補證〉，《學習與探索》，第6期，1985，頁132-135。
- 劉遠圖，〈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 鄧衍林，〈中國邊疆圖籍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
- 盧雪燕，〈院藏康熙滿文本《黑龍江流域圖》考介〉，《故宮文物月刊》，19卷9期，2001年9月，頁96-109。
- 盧雪燕，〈地理之學·非圖不明——故宮所藏古地圖探微〉，《地圖》，第17期，2007，頁109-124。
- 薛虹，〈彩繪滿文黑龍江地圖和格爾比齊河的位置〉，《清史研究》，第4期，1993。後收入《薛虹學術論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頁371-382。
- 鞠德源，〈關於明代奴爾干永寧寺碑記的考察和研究〉，文獻叢刊編輯部編，《文獻》，1980年第1輯，頁64-90。
- 韓儒林，〈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記〉，原載《學思》2卷2期，1941年。後收入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編，《韓儒林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頁766-773。

小長谷有紀、楊海英編著，《草原の遊牧文明—大モンゴル展によせて》，吹田：財團法人千里文化財團，1998。

内藤虎次郎著，《清朝史通論》，東京：弘文堂書房，1944。

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

今西春秋，〈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蹟輿圖索引〉，《東方學紀要1》，天理大學おやさと研究所，1959，頁220-268。

石山洋，〈レオ・バクロフの地図学史研究〉，《東海大学紀要》，課程資格教育センター6，1996，頁27-54。

吉田金一，《近代露清関係史》，東京：近藤出版社，1974。

吉田金一，〈郎談の吉林九河図とネルチズク条約〉，《東洋学報》，62卷1、2號，1980，頁31-70。中譯見劉顯叔，〈郎談《吉林九河圖》與尼布楚條約〉，《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3卷1期，頁68-83。

吉田金一，〈ネルチズク条約で定めた清とロシアの国境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2卷1號，1983，頁62-87。

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ズク条約》，東京：近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1984。

吉田金一，《ロシアと中国の東部国境をめぐる諸問題：ネルチズク条約の研究》，東京：環翠堂，1992。

阿南惟敬，《露清対立の源流》，東京：甲陽書房，1979。

阿南惟敬，《清初軍事史論考》，東京：甲陽書房，1980。

和田清，《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蹟輿圖》，大連：社團法人滿洲文化協會，1935。大連圖書館藏。後收入和田清，《東亞史論叢》，東京：生活社刊，1942，頁569-579。

松浦茂，〈ネルチズク条約直後清朝のアムール川左岸調査〉，《史林》，80卷5號，1997，頁76-106。後收入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6。

承志，〈満洲語で記された『黒龍江流域図』〉，藤井讓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編，《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195-222。

承志，《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會，2009。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

宮紀子，《モンゴル帝国が生んだ世界図》，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7。

野見山温，《露清外交の研究》，東京：酒井書店，1977。

- 船越昭生，〈康熙時代のシベリア地圖—羅振玉舊藏地圖について—〉，《東方學報》，第33冊，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3，頁199-218。
- 船越昭生，〈ウイットセンの北東アジア地図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史林》，47卷1號，1964，頁112-141。
- 楠木賢道，〈黒龍江將軍衙門檔案からみた康熙23年の露清関係〉，《歴史人類》，第24號，1996年5月，頁117-172。
- 楊海英，〈清朝時代伊克昭盟盟長バダラホの奏凱図—『圖開克跡』が描くオルドス七旗—〉，《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32卷4號，2008，頁626-657。
- 鶯淵一，〈滿文老檔による盛京輿図の歴史地理的研究〉（其一、二、三），内陸アジア史学会編，《内陸アジア史論集》，第2號，国書刊行会，1979，頁117-199。
- 増井寛也，〈明末のワルカ部女直とその集団構造について〉，《立命館文学》，第562號，1999，頁537-583。
- 増井寛也，〈建州統一期のヌルハチ政権とボオイ=ニヤルマ〉，《立命館文学》，第587號，2004，頁394-370。
-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冊，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14。
- 衛藤利夫抄譯，〈滿文地図に就いて要約〉，《滿洲學報》，第2號，1933，頁1-3。
- 織田武雄，〈北京の明代世界図について〉，《地理學史研究》，第2號，京都：地理學史研究會，1962，頁3-4。
- Bagrow, Leo. *The Atlas of Siberia by Semyon U. Remezov.* 's-Gravenhage: Mouton, 1958. (*Imago mundi*, suppl. 1)
- Bagrow, Leo und R. A. Skelto. *Meister der Kartographie*. Berlin: Safari-Verlag, 1973.
- Cahen, Gaston. *Le livre de comptes de la caravane Russe à Pékin en 1727-1728: texte, traduction, commentaire*. Paris: Félix Alcan, 1911.
- Cahen, Gasto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Paris: F. Alcan, 1912. 英文參看Gaston Cahe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 Sheldon Ridge.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Shanghai: The National Review Office, 1914；日譯參看ガストン・カーエン著，東亞外交史研究會譯，《露支交渉史序說》，東京：生活社，1941。
- Fuchs, Walter. “Ue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 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滿洲學報》，第2號，1933，頁1-18。
- Fuchs, Walter “The Peking Map Collection”, *Imago Mundi*, vol. 2, 1937, pp. 21-22.
- Fuchs, Walter.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 *Monumenta Serica*, vol. 1, Peiping: Fu Jen University, 1946.
- Fuchs, Walter. “Notiz zur Pekinger Weltkarte der Ming-Zeit,” *Chiri Gakushi-Kenky*. Kyoto: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es i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1962. pp. 1-2. 地理歷史研究會編，  
《地理歷史研究》，京都：柳原書店，1962。

Futaki Hiroshi and Kamimura Akira (eds.) *Landscapes Reflected in Old Mongolian Maps*.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5.

Shinobu Yamada-Komeie. “Mapping the Russian Far East: Cartograph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Sakhalin, the Kurils, and Japan in the 18th century.” 《法政大學文學部紀要》，第54號，2006，頁55-65。

Simon, Walter and Howard Nelson. *Manchu Books in London: A Union Catalogue*.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77.

Артемьев А. Р. *Буддийские храмы ХВ в. в низовьях Амур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5. 日譯文參看A・R・アルテーミエフ著，菊池俊彦、中村和之監修，垣内あと訳，《ヌルガン永寧寺遺跡と碑文—15世紀の北東アジアとアイヌ民族》，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8。

Бартольд,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 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институте живых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Изд. 2-е. Ленинград: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 Живых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7, 1925г. 日譯文參看日本外務省調査部譯，バルトリド著，《歐洲殊に露西亞に於ける東洋研究史》，東京：外務省調査部，1937；東京：生活社，1939年再版。

## The Manchu Language “Of the Ula region Map”

Kicengg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 Japan

### Abstract

In the year of 1689, the Great Qing and Russian concluded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The following year, Heilongjiang General Sabsu and Ningguta General Bahai divided their Army in Nine Route, and proceeded to the Amur River valley for inspection throughout the border. After that, the inspection of the border had become a kind of system, annual inspections to the north of Amur River borders served as a model, for dealing with the border trouble between the Great Qing and Russian. A lot of Manchu instruments and map informations about the inspection of the border remain. Not only these informations have been little known, are rarely made a point of by academic community of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discussed by the full text of “Of the Ula region Map”. That has a direct relation with the inspection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Amur River north, Basin of Henggun River and Tuhuru River, which were done by Ningguta General Bahai in 1690 year. In this paper, using Manchu Archives, deliberates the inspection plan of Nine routes, report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personnel, and other related reports, with for the codification of the “Great Qing-unification (Da Qing Yi Tong Zhi)” Project in Kangxi period, Heilongjiang, Ningguta repeated investigations mountains and rivers, checkpoints, monuments, local products, such as human history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codification of the “Great Qing-unification” process, the use of Manchu “Of the Ula region Map” and plans to re-draw the map of various map specific process, thereby clarify the rule of the Great Qing Heilongjiang north of the little-known section of History.

**Keywords:** the Great Qing, *Heilongjiang General Sabsu*, *Ningguta General Bahai*, *Henggun River*, *Tuhuru River*



圖1 滿文長白山圖（內藤湖南摹寫釋讀）



圖2 滿文盛京圖（內藤湖南摹寫釋讀）

東洋古地圖展覽會陳列目錄

主 催 滿 日 文 化 協 會  
主 催 满鐵新京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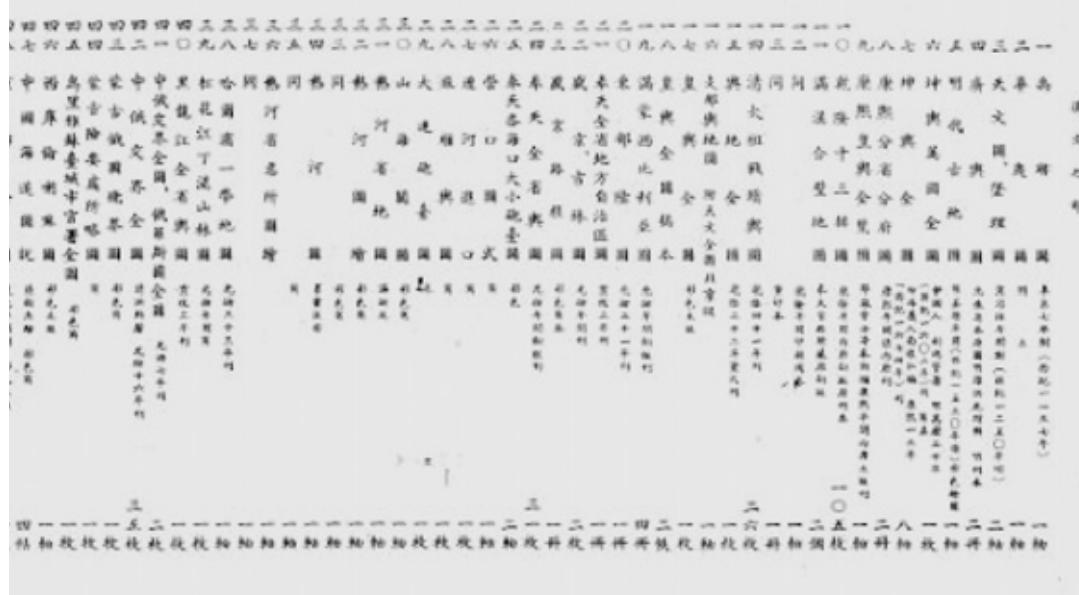


圖3 《東洋古地圖展覽會陳列目錄》（局部）



圖4 《烏喇等處地方圖》（彩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烏喇等處地方圖》（筆者摹寫）

號碼	滿洲文	拉丁文轉寫	皇輿圖滿文	皇輿圖漢文
1	ᡳጀᡶ	wargi(西)	×	×
2	ᡨጀᡶ/ᡨጀᡷ	toron bira	×	×
3	ᡴᡮᡳᡶ/ᡴᡮᡷ	kilfi bira	×	×
4	ᡢጀᡶ/ᡢጀᡷ	uyeken alin	×	×
5	ᡢጀᡷ/ᡢጀᡷ	miyemilen bira	×	×
6	ᡦጀᡷ/ᡦጀᡷ	cicakin bira	cicakin bira	乞啓琴河
7	ᡦጀᡷ/ᡦጀᡷ	elgeken bira	×	×
8	ᡦጀᡷ/ᡦጀᡷ	munike bira	×	×
9	ᡦጀᡷ/ᡦጀᡷ	miyoo wan alin	×	×
10	ᡦጀᡷ/ᡦጀᡷ	talin bira	×	×
11	ᡦጀᡷ/ᡦጀᡷ	asarni bira	asarni bira	阿薩里河
12	ᡦጀᡷ/ᡦጀᡷ	niowakta bira	×	×
13	ᡦጀᡷ/ᡦጀᡷ	weigi bira	×	×
14	ᡦጀᡷ	julergi (南)	×	×
15	ᡦጀᡷ	amargi(北)	×	×
16	ᡦጀᡷ/ᡦጀᡷ	tuhuru bira	tuhuru bira	兔乎魯河
17	ᡦጀᡷ/ᡦጀᡷ	imile bira	imile bira	厄米勒河
18	ᡦጀᡷ/ᡦጀᡷ	gerbi bira	×	×
19	ᡦጀᡷ/ᡦጀᡷ	amal bira	×	×
20	ᡦጀᡷ/ᡦጀᡷ	si mur bira	×	×
21	ᡦጀᡷ/ᡦጀᡷ	henggun bira	henggun bira	亨滾河
22	ᡦጀᡷ/ᡦጀᡷ	luku bira	×	×
23	ᡦጀᡷ/ᡦጀᡷ	hada ul bira	hada ul bira	哈打五而河
24	ᡦጀᡷ/ᡦጀᡷ	imu bira	imu bira	衣母河
25	ᡦጀᡷ/ᡦጀᡷ	samnin bira	×	×
26	ᡦጀᡷ/ᡦጀᡷ	sahaliyan ula	sahaliyan ula	薩哈連烏喇
27	缺(*ᡦጀᡷ)	缺(*dergi) (東)	×	×

《烏喇等處地方圖》地名表記對照表